

世界历史名人

思想家



SU GE LA DI

# 苏格拉底

陈德正

新蕾出版社

世界名人

思想家



SU GE LA DI

# 苏格拉底

陈德正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格拉底/陈德正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00.1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杨生茂,顾传青主编)  
ISBN 7-5307-2305-7

I. 苏...

II. 陈...

III. 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 — 生平事迹

IV. B50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4655 号

---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om

地 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300020)

电 话:总编办(022)27301675

发行部(022)27221133 27221150

传 真:(022)2730167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新华印刷三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1/64

字 数:58 千字

插 页:2

印 张:2.25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40 元(全套一百册)

---

# 序

当时光脚步迈入 21 世纪门槛的时候,新蕾出版社向全国少年读者推出这套内容丰富、文采绚丽、装帧精美的《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百人百册)。这的确是件令人喜幸的事情。现今我们正大力提倡和开展素质教育,这一具有大气派的出版举措正应答了时代的要求。

这部丛书生动而翔实地勾勒了世界历史上 100 位出类拔萃的英豪人物。他们的事迹像熠熠生辉的点点繁星,照耀着我们仰望的无垠长空。他们中有胸怀韬略、驰骋沙场的伟大统帅,有献身民族解放大业、争取国家独立的革命志士,有叱咤政坛、创造时势的杰出政治家,有思想深邃、追求世理的哲学家,有虔笃济世的宗教

Funbi

家,有探究自然奥秘的科学家,有以宏大精妙的声响抒发情怀的音乐大师,有以睿智的观察力描绘社会众生相的文学家。他们把高尚理想和为理想奋斗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洒向人间,注入青史。他们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学习榜样。

书中人物犹如历史长河中的大川巨泊和胜地奇观。阅读这套丛书固然会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开阔我们的视野,借古达今,做一个有见地的人。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效法英雄豪杰、先知哲人的高尚理想和情操,用他们的言行濡沫我们的思想,激励我们的行动。今天的少年朋友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以便将来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这样,方不愧于我们的时代、不愧于我们的社会,方能追随先哲的脚步,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新蕾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所持的友爱厚意和高瞻远瞩的创新精神。

杨生茂

1999年11月15日



新 雷 出 版 社

丛书学术指导委员会

杨生茂 刘家和  
马克垚 张弘毅  
于 可 张 象  
曹仲平 傅希春

策 划/纪秀荣

主 编/杨生茂 顾传普

副主编/郑秀桂 陈德军

编 委/国荣洲 王文婷

张殿英 张 访

# 目 录

苏格拉底

5	引子
6	生于石匠之家
	躬逢民主盛世
22	“实用即美”“以柔克刚”
31	苏格拉底与“智者学派”
38	奇异的征兆



42	探索自然宇宙
47	苏格拉底的“爱情观”
53	“神说错了”
58	勇敢的苏格拉底
64	坚持正义 谴责暴政
72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
82	哲人之死
92	逃亡的道德
99	悲剧何以发生
119	苏格拉底的哲学伦理 思想
131	苏格拉底的历史地位
137	结语
139	编后记



##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 古代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石匠和雕刻匠, 青少年时代的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手艺, 熟读过荷马的史诗以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 曾师事著名哲学家阿那克撒哥拉, 学习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30 多岁的时候, 他转而探讨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 成为一名社会道德教师。苏格拉底自奉节俭, 招收弟子, 但从不收取学费。他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同各方面人士辩论诸如战争、政治、正义、勇敢、德性、节制、真善美等课题, 并独创了富于启发性的反

诂式教学法。

公元前 431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作为雅典公民,苏格拉底曾三度从军作战,在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奋力击退敌军,从战场上救出身负重伤的色诺芬和亚西比德,使他们幸免一死。公元前 406 年,苏格拉底当选 500 人议会主席团成员。在任上,他不顾众人的反对,否决过对 8 位将军的不公正判决。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民主政体被斯巴达支持的“30 暴君”的统治所取代,苏格拉底威武不屈,拒绝与之合作,受到迫害。他不满于民主政体特别是雅典后期的极端民主派的统治,不遗余力地予以攻击。公元前 399 年,雅典恢复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指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诱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面对死亡,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慨然赴死。临刑前,与友人谈了一番灵魂不死的问题,然后镇定自若地从狱卒手中接过毒酒,一饮而尽,终年 70 岁。



苏格拉底本人没有任何著述,他的行为和学说,主要是通过其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在政治上,他轻视劳动群众,反对民主政治,主张“智者”、“能者”治国。在哲学上,他认为物质世界是神创造的,精神是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认识自己”是哲学的第一要素;知识是靠理性的探索而来,真理只有通过论辩才能获得。在逻辑学上,他第一次提出了归纳和定义的方法。在美学上,他认为“美”作为一个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就是指有益和有用。如果是既无益又没用的东西,就称不上是美的东西。他强调美与善是一致的,美的东西就是善的东西;美主要不在其外表,而在于行为,在于对社会的效能。苏格拉底还阐明了美与知识的关系,认为美源于知识,没有知识便不能为善,也就谈不上美。他还认为知识和美通过教育可以获得,承认自己的无知才能求得知识,这是认识美的源泉。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对以后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在欧洲文化史上,苏格拉底被视为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圣人,几乎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



所占的地位相同。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中含有许多辩证法的因素。其思想言行深刻影响了柏拉图等人,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引 子

公元前 399 年春末的一个黄昏，在雅典城角落的一间昏暗牢房里，一位白发苍苍的古稀老者镇定自若地接过狱卒递来的毒酒一饮而尽，之后安然地躺在木床上慨然赴死。这位老者之死使雅典城邦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因为被处死的是为它在哲学上赢得永久光荣的伟大哲学家。

这位倔强的老人就是苏格拉底。

那么，他究竟犯了何等弥天大罪竟被雅典公民法庭判处了极刑？他生活的时代及其生平事迹又是如何呢？下面就让我们展开古希腊的历史画卷，从中找寻答案吧！




## 生于石匠之家 躬逢民主盛世

苏格拉底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历史上没有记载他到底生在何年何月，其弟子柏拉图（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在著作中提到他受审处刑时已 70 岁了，因而可以推测他大概生在公元前 469 年。其父索福罗尼斯科，据说是个不错的石匠和雕刻匠，正因如此，成年时代的苏格拉底时时不无骄傲地把自己的祖先归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能工巧匠代达罗斯（据说他设计了被称为“迷宫”的米诺斯宫殿）。虽说索福罗尼斯科是个手工艺人，但在其所在的雅典城附近的阿洛贝克村里却挺有威望。母亲斐娜瑞特在接生方面很有专长，是个业余助产妇。她曾经和前夫生有一子，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同母异父哥哥派特罗克。



苏格拉底从父亲那儿接受了基本的启蒙教育,了解一些几何学与音乐知识,还学到一手很不错的雕刻手艺。据公元2世纪的哲学家第奥根尼·拉尔修说,那时的雅典城里还陈列着苏格拉底的雕塑作品——和平三美神像。苏格拉底显然对父亲的行当缺乏热心,成年后就迷上了哲学,并因此而变得极其穷困,生活时常没有着落。据说每当他手头拮据时,朋友克里同总是给他积极的帮助。克里同与苏格拉底年龄相仿,与苏格拉底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还让自己的儿子随他学习。

苏格拉底出生的年代正是雅典在各方面蒸蒸日上的时代,上一代雅典人的勇敢与开拓精神是他们这代人所受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雅典人的光荣与骄傲给他以极深的印象。就在他出生前20年,雅典城东北60里处打起的马拉松战役,雅典人以少胜多击败了波斯王大流士。10年以后,雅典人又在萨拉米海湾几乎全歼了波斯海军。苏格拉底出生前,爱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在上演时获得头奖,使诗人在作为“人类的教师”方面无疑取得了显著地位。这出



戏充分表达了雅典人的自信：他们甚至可以借表现敌方的勇敢来显示自己那种战无不胜的气度。苏格拉底 10 岁左右大概看过这位悲剧诗人的《阿加米农》的演出。而索福克利斯的《俄底普斯王》则更应该是他熟悉的。据说苏格拉底与希腊最后一位有成就的悲剧诗人欧里庇底斯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后者常从他那儿得到创作的灵感。

随着苏格拉底的成长，雅典步入了空前繁荣的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奴隶制经济、民主政治与学术文化都得到了蓬勃发展而臻于极盛。尤其是民主政治可以说与苏格拉底一生的命运攸关，对其政治观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公元前 469 年出生到公元前 399 年被处死，苏格拉底经历了雅典民主政体由兴盛繁荣到腐败衰落的全过程。

苏格拉底是在雅典民主制的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当他幼年时期，人们传颂着泰米斯托克利（雅典将军，曾指挥海军击溃波斯军队的侵略）的丰功伟绩；当他少年时期，又亲眼看到客蒙（希波战争期间雅典将领）的赫赫战功。到公





元前 443 年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掌握了雅典大权,雅典民主政治进入了极盛时期。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公民的确享有罕见的民主权利。一切官职(除高级军职和财政官员)均由抽签产生,一切重大国策均由公民大会决定,一切审判均由公民法庭进行,一切权力属于公民。这样做是否影响国家管理的效率呢?对此,古希腊反民主制的理论家都表示怀疑。雅典人亚西比德曾把这种民主制称做“公认的愚蠢”。但从雅典历史的发展变化看,民主政体的效率绝不亚于许多古典作家推崇备至的斯巴达贵族制,甚至比后者更有效。100 多年里,这个国家沉浮了几次,但始终是希腊政治、军事、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思想文化则为古希腊之冠,影响至今不衰。这归功于雅典民主政体有一套多年不断完善的运作机制。

在整个民主政治的各级机构中,凌驾一切的是具有立法、行政、司法多重功能合一的公民大会,具体说来就是享有立法、改宪、监督法律实施、任命或罢免公职人员、总管国家军政、外交、宗教各种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最高权力机



关。

公民大会每年召开 40 次,由 500 人议会主席团主持。主席团按地域部落分成 10 届,每届主席团成员 50 人,主持公民大会的次序由抽签决定。前 4 届每届在任 36 天,后 6 届每届任期 35 天。通常每届主席团负责召开 4 次公民大会,议程基本是固定的。头一次就是对现任公职人员的工作进行民意测验,就其去留问题投票表决。这意味所有公职人员在 1 年任期内要接受 10 次任职审查,在每一届主席团任期内都可能被解职。所以雅典民主制历史上没有发现只能上不能下的官员。失去民心的官员,无论其出身多么高贵,地位多么显赫,功劳多么卓著,都有可能被解职或处罚。处罚以后也不一棍子打死,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如米尔提泰、铁米斯托克里、阿里斯提德、客蒙都受到过大会的惩处、流放,甚而伯里克利也有一年被公民大会所误解遭罢免,课以罚金。每届主席团主持头一次公民大会议题还包括听取举报人对被举报者的指控等。公民举报制是雅典人的独创。

第二次公民大会议题广泛,因公民个人要



求而异。任何与会者只要将一根羊毛包扎的橄榄枝放在大会主席台前的祭坛上,表示请愿,便可提出涉及私人和集体利益的提案。

其余两次大会讨论宗教、外交和国家日常事务。每类可有3项议题。逢到议题超出限额,便需抽签决定哪个议题优先审议。在运气面前提案者完全平等。

每次大会通过民主集中方式做出的决议都具有效力,公民必须参照执行。重要决议要刻碑留存,昭示后人。希波战争中雅典全城大搬家的决议便是刻写在石碑上而被后人发现的。

第6届主席团任期内,增加一次当时是否实行陶片放逐法的公民投票。在正常情况下,公职人员的选举在第6届主席团任期结束后的吉日举行。有时在40次大会外还举行特殊会议,依国内外局势而定。每次大会召开前5天要发通告,通报大会讨论内容。大会会址有时在广场兼市场举行,有时在卫城附近的一个斜坡上举行,还有时在派里厄斯港口举行。公民权意味着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年满20岁的公民才可参加大会。由于公民权是一种政



治、经济、文化特权，所以只有父母均为雅典人的申请者才可成为公民。外邦移民除非对雅典有重大贡献，否则不予入籍。

由于大会频繁，公民家家有自己的私事或公事，不可能都会去出席。通常一次大会的参加者在五六千人左右，重要会议至少有 1.1 万人参加，因为按规定 6000 人以上便算多数票。

每次大会都在清晨太阳升起后举行。郊外的农民需在天麻麻亮便动身。当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后，斯基泰警察就各就各位，准备维持会场秩序。会议正式开始前照例举行献祭仪式，然后一女传令人高声宣布求神灵保佑的祷文，诅咒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人。接着会议开始。主席宣布第一项议程。500 人议会可能就一项议题提出两种选择方案，或只简单陈述事实，请大会裁决。如果是拟好的议案，便进行公民举手表决，决定可否无需辩论便行通过。例行公事的提案大家漫不经心地举手，草草了事。遇着重要提案，赞成辩论的人居多，于是传令人即高喊：“谁要求发言？”大会辩论旋即展开。



并不是所有与会公民都可上台发言。道德不良者只有表决权而无发言权。比如打爹骂娘者,不奉养父母者,未服兵役者,同性恋者,男妓女妓,将个人财产挥霍一空者均不得上台。若这号人混上去,被底下公民揭发劣迹属实,就会立即被赶下台去,折了面子、丢人现眼不说,还要课以罚金,这辈子别想在人前抬起头来。

合格的辩论者轮番上台发表动人的演说,阐述个人意见。说到激昂之处,听众的情绪也随之起伏,所以演说术对一个热心政治的公民至关重要。在这种氛围中,不识字的农民也能讲一番大道理。每人发言只能一次,当一方觉得理屈词穷时,可借口有雷雨到来,请求休会,好做反驳准备,若主席看天气晴朗,则表示辩论结束,即宣布付诸表决。雅典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党派,但有不同利益集团,如贵族派。在伯里克利时代,贵族派抱成团,开会时聚在领袖修昔的底斯周围,颇引人注目。

大会休会期间负责日常事务的便是 500 人议会。议会成员的产生,以每地域部落 50 人抽签来决定,每人一生只可任两次。当选公民组



成的 10 届主席团每天都需抽签产生一位新的执行主席值班主持一切事务。主席在职的 24 小时便是公民民主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掌管国玺、国库和档案库的钥匙,负责召开议会。如果适逢公民大会召开,这天的主席团主席就是大会主席。根据法律,执行主席一职每人只可任一次,因此雅典最高公职无任何神秘的光环,公民只要手气好,抽上签,行为检点,都可坐一天最高领导人的交椅。所以雅典公民人人都是统治者,人人又都是被统治者。

500 人议会如同一架不停运转的机器,几乎每日白天都在广场南部一圆顶厅开会。另有当日执行主席率每届主席团中的 1/3 的成员 24 小时住在大厅内值班,免费用餐。参加议会的公民每日津贴达到 5 奥波尔,主席团成员另加 1 奥波尔。当选议会的成员原来不知怎样开会,泡上一届后也成了开会的行家。

就 500 人议会与公民大会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办事机构,起草法律、议案,但他们无最终决定权。

体现民主政治的第三大机构是公民法庭,

审判员如梭伦时一样,共 6000 人。主要职能除审理民事和刑事诉讼(杀人案除外),还对公职人员进行资格审查。法庭日常工作量繁多,除了国内诉讼外,提洛同盟附属国的许多起诉也归它审理。所以法庭除了节庆和公民大会开会日之外,其他日子差不多都要开庭。雅典喜剧中有个老农夜里就要上路以便赶在天亮前赶到城里参加审判工作。这是何等的公共活动热情!法庭开庭的程序如下:首先由 9 位执政官和一名司法书记抽签决定十个公民法庭分别受理哪些案件。再抽签选举 10 个法庭的审判员集团。每一庭的审判员均包括十个部落的公民,总数 500 人。重要案件两庭合一,最重要案件三庭合一。然后,十法庭审判员出庭再抽签选出主席,再由主席抽签选定若干法庭工作人员。每一程序中都采用抽签方式,纯粹为了防止行贿受贿行为对案件审理的干扰。最后审判开始。如遇私事案件,一次审 4 件,公事案件一日审一件。原告和被告的申述有时间限制,以水時計计时。雅典没有律师制,原告和被告都需亲自出庭申辩,不可盘问证人,只可互相提



问,证据必须是证人目睹或实物,听来的证据无效。法庭申辩同样需要以雄辩的口才来影响审判员,所以雅典有为当事人代写讼状的职业作家,当事人背熟这捉刀代笔的状态子或辩辞后在法庭上发言。审讯完毕,审判员不经商讨即进行投票判决。宣判是终审判决,除非胜诉一方的证人在另一次审判中被控提供伪证。雅典并无严格量刑标准,对犯罪的惩罚包括罚金、没收财产、监禁和死刑。死刑处决方式有石头砸死,棍棒打死,喝毒液处死。苏格拉底便是在非常时期被用毒芹草制成的毒液处以死刑的。

公民法庭不是惟一的司法机构。故意杀人案统归贵族议会审理。公民大会和 500 人议会也兼有司法职能。国家公职人员的诉讼,大多由 500 人议会受理,公民大会则接受司法执政官提出的各种诉讼。受理对主席团成员、将军不法行为的控告。

雅典还存在一种民事调解机构,由 40 位 59 岁以上的老人组成,走街串户调解纠纷。凡仲裁仍不能使当事双方满意者才移交公民法庭。





雅典国家虽小,但事情千头万绪,不能事事都由三个民主机构办理。因此在公民大会和500人议会之下还有多达几百人的各级主管和办事单位。每单位通常10人,也是平均分配,一部落一个,如十将军、司库官、收款官、公卖官、市场监督、港口监督、祭礼官等等,均由选举产生。凡公民都有被选举权。当选官员任期1年。除关系国家安危的十将军职务外都不能连选连任。所以雅典各级政府都由业余人员组成,官民不分。伯里克利时代因战事增多,十将军作用突出,可委以非常权力,在国外自行其是。在国内享有在500人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提案优先权。但这不等于十将军可超越公民大会和500人议会,他们始终受制于公民大会。

有比较才有鉴别。细观古代世界各国,像雅典这样维持时间如此之久、制度如此之完善的民主政体实在是绝无仅有。古代有许多国家都曾经留有一条原始民主的尾巴,但随着剥削阶级统治的牢固确立,这条尾巴都逐渐退化殆尽。只有雅典人在阶级社会的新条件下,扭转了政体向贵族、寡头和君主制发展的方向,使原



始公社的集体民主制在新时期得到发展、创新，成为长达近 200 年的统治形式，广泛影响到周围国家，直到被外来势力所扼杀，这不能不说是雅典人的历史创举。

在民主开放的气氛中，雅典的文化百花齐放，巨人辈出。古代西方最卓越的思想家、艺术家、历史家、科学家……不是雅典人便是长期在雅典居住、著书讲学的移居学者。比如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阿纳克萨哥拉，古代最博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希腊三大历史家——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古代西方史学思想发展的顶峰代表修昔的底斯、续写修昔的底斯著作的一代史家色诺芬，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悲剧家索福克利斯、幼里披底斯，喜剧之父阿里斯多芬，大修辞家德摩斯提尼、伊索克拉特，著名雕刻家菲迪亚斯等等。伯里克利曾在公众演说中骄傲地宣称“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这当然不是浮夸虚妄之言。反观来库古改革后的斯巴达，却未留下一位值得一提的思想文化人士。看来这也绝非偶然。任何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只有在思想解放



的条件下才可能大量出现。在斯巴达、波斯帝国这样的国家里,人们每说一句话都要小心,每写一字都要视统治集团的好恶为转移,人们的聪明才智就只能被局限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因而也无法产生深刻的思想和文化产品。

像任何历史现象一样,雅典民主制也包含了它本身的弱点,这种弱点在那个时代是无法克服的,即它无法防止民主,以及她的孪生姐妹自由,走向极端化。从历史上看,民主和自由都是肯定的字眼,然而如果运用失当,它们也会转向自己的反面。其实,早在民主制的“黄金时代”,它即已露出了极端化的倾向。比如本来是为了预防出现专权者的陶片放逐法,逐渐变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的雅典当权者很多遭受放逐(在当时这是一种很重的刑罚),不管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更不问其对国家有何功劳。这当然不是正当的行使,而是滥用民主权力。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给希腊世界带来了空前的震动和破坏),

奴隶制陷入危机,民主制的根基也发生了动摇。随着伯里克利这位“政治权威”之星的陨落,政治舞台终于成了野心家角逐的战场,城邦经常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些野心家自称“平民领袖”,表面上高喊“平民至上”的口号,俨然是民主的旗手,其实很多人是民主的蛀虫。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一部分城市无产公民。这部分人由于经济上没有出路,就利用自己的公民权,企图在政治上投机。乡村的农民(这是昔日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为得一点津贴就到城里参加公民大会了,公民大会成了城市无产公民高谈阔论的场所,甚至连公民法庭,由于经济的原因,也只有老弱病残或者不务正业的人才去任职了。这些人不因被剥削而变穷,而是因剥削别人太少而变穷,他们当然不代表被剥削者的利益,同时也不能真正代表剥削者的利益,他们成了即将被历史淘汰的可怜虫。苏格拉底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批评过这些人,将这班人视为极端民主的酵母菌,许多事情都坏在他们身上。

这样一批人聚集在雅典公民大会中,使这



个大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大会变得容易冲动,容易为偶然的原因而改变意见,出尔反尔,而又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而又朝秦暮楚。人人以我为核心,“人是万物的尺度”已经没有当年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负责精神了,而成为一种主观主义、唯我主义的遁词。如此,苏格拉底被这样的公民法庭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也就不足为奇了。

## “实用即美”“以柔克刚”

苏格拉底不是雅典人审美标准上的那种仪表堂堂的男子汉。据说他相貌奇丑，大扁脸，朝天鼻，烂眼角，双目暴突如牛眼，嘴巴奇大无比而且嘴唇特厚，走起路来挺着肚子，姿势十分难看。而苏格拉底又常常说到美之类的东西，这使他的学生不禁向他提问：你如何说明自己的美呢？这位哲学家不无自嘲地做出这样的回答：实用的才是美的；一般人的眼睛深陷，只能往前看，而他的眼睛则可以侧目斜视；一般人的鼻孔朝下，因而只能闻到自下而上的气味，而他的鼻子则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嗅出气味；至于那大嘴巴、厚嘴唇，则无疑使他的吻比一般人来得更有力、更丰润而且接触面更大。他惟一觉得不大方便的就是他大得超出自己希望的肚皮，因而时时不顾别人的惊讶，靠跳舞来减肥。



苏格拉底身体结实,能吃苦耐劳。他一年四季总是穿着同一件大褂子,不畏寒热,四季赤脚,甚至在冰天雪地的北方色雷斯作战的时候也还是穿着那件单衣,光着脚在冰面上行走自如。他安于清贫,不求名利,饮食简单,完全可以用“一簞食,一瓢饮”来形容。肚子饿了就随便吃点,渴了就喝点饮料,决不沉溺于美食。他曾说,“吃简单的食物就是最好的饮食方法”,“必须抗拒有诱惑力的食物,如果肚子不饿还吃东西,不渴却喝饮料,会使灵魂和头脑堕落”。当时的一位学者甚至说:“如果奴隶过苏格拉底那样简朴的生活,奴隶也会逃掉的!”

据说苏格拉底很少喝酒,每逢节日同朋友聚会时却酒量惊人。一次他和几个人讨论人生哲理,竟做长夜之饮,别人先后醉倒了,只剩下他和另外两个人。黎明时分,另外两个人也已烂醉如泥,他却若无其事地入水洗浴,浴罢走上街头,一如往常。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还告诉我们,每当他就餐时,饥饿感总是他最好的作料;任何饮料对他来说都是可口的,因为他从来不在不渴的时候喝水。



苏格拉底的另一弟子雷尔修斯也这样叙述：好几次听到他引用如下的诗句——

“银器和绯衣，是演戏的好道具，却不适于平常的家居生活。”

温和的性格，平静的心境，有节制的生活，使苏格拉底直到晚年都保持着充沛的精力。

苏格拉底的婚姻生活开始得相当晚，直到四十七八岁的时候才与珊蒂柏结婚。据说她脾气暴躁，动则大发雷霆。苏格拉底却能把丈夫的权威抛在一边，用谦和冷静的态度相待。他所以这样做，据说是想用以柔克刚的办法来改变妻子的性格。虽然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均告失败，但他并没有灰心，反而更明确地认识到，应当以妻为师，因为在培养自己的忍耐和克制能力方面，妻子可以对他进行必不可少的严格训练。对于何以要找这样一位时常发火的妻子，苏格拉底对那些不满的弟子说：“既然我要与各种人打交道，那么如果我能忍受她的坏脾气，在与别人的交谈中就不会有什么事会令我不快的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珊蒂柏在洗衣服，想请丈夫帮个忙。苏格拉底正



在和朋友讨论问题,谈得津津有味,可能没有听到。她就唠唠叨叨骂起来了,越骂越气,终于怒气冲冲,端起一盆脏水,朝着苏格拉底劈头盖脸地浇了下来。苏格拉底浑身湿透,就像从水中捞出来的一样。看来一场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不料,苏格拉底并没有报以老拳,可是那个朋友却吓坏了,惊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苏格拉底哈哈大笑:“没有什么,雷鸣过后,必有大雨,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惧内吧?其实不然。苏格拉底随时注意用理智来克制感情,相信能忍才能自安,尽量不让外来的刺激扰乱内心的平静,这样的意识和能力,在他的同胞中是鲜见的。珊蒂柏作为一个女人,要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却没有社会地位(按雅典法律,妇女没有公民权),虽然性情有些暴躁,我们对她寄予的同情应当多于责备。她对丈夫是体贴的。他们生了3个儿子,长子叫兰克斯勒,次子叫小苏格拉底,幼子叫曼尼雪纳斯,到苏格拉底死时,大儿子才不过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最小的甚至还要抱在怀里。苏格拉底对妻子和三个儿子都非



常关心和爱护,据说有一次,苏格拉底的长子兰克斯勒惹母亲生气,苏格拉底看到这种情形,当场教训他,但他反而对苏格拉底说:“母亲那种暴躁的脾气,谁都无法忍受!”

“野兽的残酷与母亲的残酷,哪一种更令人无法忍受?”

“我认为是母亲这一边。”

“那么到目前为止,她有没有咬过你,踢过你?有很多人被野兽咬过、踢过。”

“虽然她没有如此待我,但是,就算她能将全世界的东西统统给我,我也不愿跟她在一起,我实在不想听她骂人的话。”

“小时候你就很顽皮,常说些不该说的话,增添你母亲许多麻烦,尤其是你生病时。”

“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事,或说过一句话,使母亲觉得羞耻。”

“你母亲说的话,会比演戏时两个人的对话还要难听吗?”

“戏是戏,与现实生活不同。演戏时的打骂是因剧情的需要,不会使对方心灵受到伤害。”

“但是,你应该也很清楚,你母亲所说的话,



并没有恶意,相反地,她确实是希望你比别人更好,更有出息,你何必生气!难道你认为,母亲对你怀有恶意?”

“我没有这样想。”


这时,苏格拉底继续说:“你生病时,你的母亲向神祷告,希望神赐福给你,你认为她冷酷吗?像这种母亲你都无法忍耐,我想,你大概对任何事都缺乏耐心,难道有人指使你如此做吗?或是你已下定决心,不让任何人高兴,无论他是谁,你都不该听从他们的话。”

“我当然不是如此!”

“你冷时,母亲会替你生火取暖。人人都希望周围有帮他做好事的人,你若不信,可想想看,当你失败时,是不是希望有人为你带来好运,援助你呢?你是否也希望邻居都喜欢你呢?”

“没有错,我是这么想!”


“还有,当你在陆地或海上航行时,你的同伴或是你曾经遇见的所有人——无论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或是敌人——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或许这些人的好意,对你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是很重要。”

“既然这些事你全懂，为什么对你的母亲，如此不尊重？这样做对吗？国家对忘恩的人，不加以惩罚；对受到恩惠而不报答的人，也会原谅，但是惟独不能原谅不尊重双亲的人，不孝顺的人会受到惩罚，他成为领导者的资格会被取消。国家进行祭典时，这类人的祷告不会被接受和感激；不仅如此，如果有人不去参加过世双亲的祭典，国家就会派人调查他的身份，并惩罚他。所以，孩子！你要好好想想，假使有不孝敬父母的行为，要立刻请求神原谅你，否则神会认为你是一个不知感恩的人，而不赐福于你，其他人也会因你对双亲的不尊重，而轻视你，最后你将成为没有朋友的孤独者，因为一旦人们发觉你是不知感恩的人，就会认为没有必要与你打交道，更没有必要对你好，因为你不会感激他们。”

苏格拉底又开导儿子说：“你应该不会认为人类是为了情欲，才生孩子的吧？”苏格拉底希望缓和儿子与母亲之间的隔阂，并使儿子感觉父母责任的重大与艰巨。



男人必须照顾妻子,必须为即将诞生的孩子的一生利益打算并且做好准备。女人冒生命的危险怀孕,不但担负着很重的责任,还要忍受痛苦,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生出小孩子,她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还要照顾和养育他们。

刚出生的婴儿不知道是谁在照顾他,也无法说出自己的需要,身为母亲的人,必须主动而耐心地去了解婴儿究竟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母亲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不分昼夜地照顾,但是从未想过,孩子将来会如何地报答她。

一般父母都认为,光是让孩子衣食饱暖仍是不够的,小孩一旦到了学习的阶段,双亲必须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为人处世的方法全部交给他。假使有学问比自己更好、品德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还必须花钱让小孩去向那个人学习。

总之,为了使自己的子女成为更完美的人,父母亲总会倾其全力的。儿子似乎感到了羞愧,默默地低下了头。

苏格拉底那独特的生活方式,怪异的性格,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喜剧家们想描写的最佳对象了,苏格拉底生前不止一次被喜剧家搬上过舞



台,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被恩格斯誉为“喜剧之父”的阿里斯托芬的《云》。在《云》中,苏格拉底蜷缩在一只吊在空中的篮子里,向学生讲一些稀奇古怪的话。阿梅普西亚在另一出戏中宣称:“在那极少的几个人里,他最出色,而在我们许多人中则是愚蠢的。他研究了一切,但就是没有想想该如何搞一件新褂子。”他还挖苦苏格拉底“生来就仇恨鞋匠”,并且总是不停地向人献殷勤。还有人挖苦他吃了上顿就不管下顿,满身污垢,贼头贼脑,把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无聊的辩论上。这些都无非说明苏格拉底的其貌不扬和日常生活之俭朴。



## 苏格拉底与“智者学派”

苏格拉底生活在空前繁荣的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因此吸引了四方的游人，各种文化纷纷涌入，成了名副其实的“希腊的学校”。无论是爱奥尼亚传统的自然哲学，还是南意大利的思辨哲学，或者毕达格拉斯学派热衷于“数”的神秘学说以及专司辞令的智者学派，都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雅典。其中尤以智者学派对苏格拉底影响最大。

智者学派又称诡辩学派，是指一批以外邦知识分子为核心的职业教师。他们席不暇暖，周游各地，传播知识，起过积极作用。后来逐渐变得热衷于诡辩术和文字游戏，从怀疑传统宗教变得怀疑一切，他们替美德辩护，也替罪恶辩护，甚至可以从错误的前提得出正确的结论，著名智者学派哲学家芝诺为了否定运动的存在，



就曾提出过“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和“飞矢不动”的命题。阿基里斯本来是古代荷马史诗中一个善跑的英雄。有人问芝诺：“你说运动是不存在的，难道飞毛腿阿基里斯连乌龟也追不上吗？”芝诺回答说：“如果你们承认运动，就会导致承认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是有道理的。你们看，现在假设乌龟在前面，阿基里斯在后面，相隔距离是100米。再假设阿基里斯的速度是乌龟的100倍。就是说，阿基里斯跑100米，乌龟爬行1米，结果怎样呢？结果只能是这样的：当阿基里斯跑完100米到了乌龟原来所在的地方时，乌龟已经爬行到阿基里斯前面1米的地方去了。总之，阿基里斯为了赶上乌龟，就一定要先跑到乌龟原来的地方，而这段时间内，乌龟又一定往前爬行了一段距离。所以，阿基里斯永远都只能做到无限地接近乌龟，却赶不上更不能超过乌龟。你们看，你们承认运动，却得出了跑得最快的人追不上爬得最慢的乌龟这个荒谬结论。为了避免这种荒谬结论，我们就不能承认运动，也就是说，运动是没有的。”

经芝诺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感到很困惑。





就是说,本来人人都知道,事实上阿基里斯是一定能追上和超过乌龟的,但是在道理上却不容易驳倒芝诺的论证。芝诺讲完后,有一个人仍然不服气,就问:“难道飞着的箭也是不动的吗?”

这个问题一提出,周围的人都以为这次一定可以把芝诺难倒了。可是,芝诺却肯定地回答说:“飞着的箭其实也是不动的。这一点并不难证明。你们看,现在假设射箭的那地方离箭靶的距离是10米,再假设箭从射出到插到箭靶上的时间是1秒钟。那我们可以想一想,箭在射出去0.1秒钟时在什么地方呢?大家都会说是在第1米的那个地方,射出去0.2秒时又在什么地方呢?在第2米的那个地方……这就是说,不论是在哪一刻的时间,箭都一定在一个地方占有一定的空间,也就是在每一时刻箭都在每一点上不动,所以说,飞着的箭是不动的。”

芝诺提出的“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和“飞矢不动”等命题,目的都是为了否定运动。这些命题本身是错误的,但要从理论上去驳倒这些论证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公元前 449 年,40 岁的芝诺访问雅典,当时只有 20 岁的苏格拉底慕名前往,与其进行了一场相当深奥的讨论。而在此前一些时候,另一个智者学派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并且旋即成为伯里克利的好友,一起讨论有关法律的问题。他不仅给雅典带来了新鲜的学说,而且为雅典培养了她第一个土生土长的哲学家——阿开劳斯。这个阿开劳斯不仅关心自然哲学,而且开始把哲学引向对生活问题的考虑。年轻的苏格拉底就是从他那里开始学习哲学的,两人曾同去萨莫斯岛住了一段时间,研究哲学与天文。此外,年轻的苏格拉底曾跟智者普罗底柯学习语言与修辞学。这位智者在区分名词的细微差别方面有极大能耐,还提出“神是不存在的”,对苏格拉底有较大影响。

成年后的苏格拉底自己的哲学活动与智者们的关系特别密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与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有过极其严肃的讨论。那时的智者们还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们所传授的修辞术为公民们政治上的成功提供了极有力的武器。只要他们来到雅典,青年们就会



蜂拥而至。普罗泰戈拉宣称他教人们如何在私人和公共事务方面作出最佳的判断,从而可以在为城邦服务时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然而,对修辞术的强调导致这样一个后果,即不强调什么东西是真的,而只强调人们可以被说服去相信什么。而且由于各种文化的输入,雅典人逐步发现自己的法律与道德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道德问题被人们广泛讨论起来。

在与智者们的交往过程中,苏格拉底喜欢思考和探求。他总想知道一个事物怎样被创造出来,又怎样被毁灭掉;人们所借以思考的元素究竟是血,还是空气或水;地是平的还是圆的;环绕着地的诸天是不是一个漩涡;地是否被气支持着……关于这些问题,老师的回答不能使他满意,而他自己又觉得无能为力,因此当他30多岁的时候就把注意力从天上转向人间,着重探讨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成为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阿里斯托芬说他开设了一个专门传授诡辩术的“思想所”,那纯粹属于误解和嘲弄。

伯里克利时代,对部分雅典公民来说是最



自由的时代。这时候,苏格拉底和不少男性公民一样,大部分时间是在户外度过的。他喜欢在剧场、市场、体育场以及街头巷尾同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战争、政治、友谊、艺术,特别是伦理道德问题。他时而抨击时弊并且发表自己的独特政见,时而又心平气和地同别人进行辩论。因为谈话大多是当众进行的,和他辩论的那些自诩有知识的人往往又被问得目瞪口呆,以致语无伦次,矛盾迭出,不能自圆其说,旁观者自然觉得十分好玩,而那些出了洋相的人不免感到非常恼火。苏格拉底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不是故意想要别人出丑,而是怀着强烈的道义感,宣传他的思想,启发和鼓励他的同胞,使他的城邦“臻于至善之境”。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根本无法实现,却得罪了一批人,于是就被划到讨厌的诡辩学派里面去了。但苏格拉底对智者学派的思想、言行并非完全赞同。尤其对某些智者声称无所不知,以知识的化身自居颇为反感。在辩论时不留情面,往往弄得他们下不了台。“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这句话可能

主要是针对他们的。这些人对苏格拉底也不会有多少好感。由此可见,苏格拉底虽然受到智者学派的一些影响,但把苏格拉底当做智者学派的一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 奇异的征兆

苏格拉底从小就很古怪，自称自己的行为受一种无形的内在声音所指导。这种声音随时随地在控制着他，它虽然从来不命令他去做什么，却阻止他去做想做的事情。根据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个神秘而令人费解的声音理解为“理智之神”或者“奇异的征兆”。

这个“理智之神”，在他小时候就跟在他身边，而且常在他身上突然发生，也是使他继续生存下去的一种魔力。一旦这种声音在他心里响起，他就会进入忘我的境界，看起来有些精神恍惚。而事实上，他并不是在考虑或是研究某些问题，只是在体验某种神秘的东西，这就是冥想或“出神”。

冥想的时间和地点是不一定的。冥想时，周围的事物完全与他无关，冥想的时间或长或



短。有一年夏天,苏格拉底参战的部队驻扎在一个市镇上。早晨苏格拉底起来后,到街上去买东西。他边走边考虑问题,脑子里有一个问题总没有想通。后来他想得出神了,就站到街上一动不动地进入了“冥想”状态。开始时人们并没有注意,但当他从上午站到下午时,人们就注意起来了。有许多人围拢来看热闹,苏格拉底却无动于衷,还是在那里站着冥想沉思。到人们吃完晚饭后,发现苏格拉底还在原地不动。天黑以后,有的人出于好奇,要看看苏格拉底究竟会站到什么时候,干脆把铺盖搬到他旁边并睡在那里。结果,直到第二天天亮太阳升起后,他才从那里走开。这次冥想竟长达 24 小时之久,以至周围的人都议论纷纷,说他一定是得了癫痫性的昏迷病。

还有一次,苏格拉底被邀参加挚友阿加东的宴会,他一边走路一边思考,因此步伐很缓慢。后来他请与他同行的人先走,自己却走到隔壁人家的大门前,站在那里,别人唤他,他仿佛没听见,仍然站着不动。这种情景经常在他身上发生。人们若是看到他这样,就知道苏格



拉底又进入冥想状态了。

苏格拉底之所以会经常进入冥想状态,与他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青年时代,他已经熟读了荷马的史诗以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尤其喜爱一部名为《古语》的书,并记下其中一些箴言。据说,这部著作出自希腊神话中的诗人、音乐家奥尔菲斯之口。《古语》宣称,身体是灵魂的牢房,必须把两者分开,灵魂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自由自在地同神住在一起。所以,研究哲学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要练习死。怎样练习呢?苏格拉底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站着冥想。冥想的时候,思想集中入定,能够忘记肉体 and 周围的一切。只要达到这种程度,最高的智慧就产生出来了。这样的举动,今天的人不大容易理解,难怪有人说他得了精神病。要是和当时的雅典人相比,冥想倒是富有建设性的因素,表明苏格拉底无意执著于金钱和财富,而是在奋力追求一种理智生活。通过沉思和学习以培养智慧和道德,是他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在哲学上做出重大贡献,可以说与他经常进行沉





思冥想有直接关系。但当时也有人认为苏格拉底妖言惑众,僭立新神。不久这些便成为苏格拉底被控告的原因之一。

## 探索自然宇宙

苏格拉底年轻时曾热衷于追求自然科学的知识,对自然科学有相当的了解。他常想,万物如何生成?如何消灭?为什么人们会有冷与热等感觉?为什么人们说某些东西腐烂后又会变成其他的生物?这些自然现象引起了苏格拉底深深的思索,他决心穷究其中缘由。

在一个夏日的夜晚,天气异常闷热,许多人都坐在广场上乘凉。这时,人们看见衣衫不整、身材矮小的苏格拉底慢慢地向广场走来,他正在专心致志地观察天上的星辰,思考着天文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仰望星辰,没有注意到前面有一个土坑,走着走着,一失足,整个身子都掉进坑里去了。周围的人见了都哈哈大笑,他们围拢过来,一个饶舌的家伙奚落苏格拉底说:“你自称能够认识天上的东西,却不知道脚下面



的是什么。你研究学问得益真大啊。跌进坑里就是你的学问给你带来的好处吧！”这一挖苦又引来周围人们的一阵嘲笑。苏格拉底从坑里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看了那个饶舌汉一眼，镇定地回答说：“只有站得高的人，才有从高处跌进坑里去的权利和自由。像你这样不学无术的人，是享受不到这种权利和自由的。没有知识的人，就像本来就躺在土坑里从来没有爬出来过一样，又怎么能从上面跌进坑里去呢？”苏格拉底机智的反驳，说得那个人哑口无言，尴尬不堪，其他嘲笑的人也自讨了个没趣。上面这件事使苏格拉底认识到，当时大多数人还受着迷信思想的支配和束缚，对科学知识抱着怀疑的态度，而科学知识对于人类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向人们说明科学知识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苏格拉底决定找个机会教训那些嘲弄科学知识的饶舌汉。

这一年，苏格拉底根据他所掌握的天文气象和其他科学知识，预计下一年橄榄将要获得好收成。到了冬天没有人需要橄榄榨油房的时候，他变卖家产凑足了一笔钱，把全城的榨油房



包租了一年。因当时无人与他争价,因此租金极低。到了下一年,橄榄果然获得大丰收,人们争相租用油房。这时,苏格拉底转而以很高的价钱出租油房,因此便发了一笔大财。事后,那些饶舌汉又到处散布说,原来苏格拉底研究学问是为了赚钱,现在他有学问了,做起生意来大家都不是他的对手,要时刻提防着他才行。苏格拉底听说后,便公开向人们表白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证明科学知识对人的生活是有大用处的,只要有了知识,要赚钱并不难,但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目的并不是自己发财致富,他们的雄心壮志在别的方面。他们的目的是运用人的智慧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使人更有力量同自然做斗争,为人类造福。据说,苏格拉底由于认真研究各种自然现象,所以能预测天气的变化。有一次,人们到奥林匹亚去看赛会,去的时候天气很好,他却预见将要下雨,便披上一件皮斗篷。当时很多人都取笑他。后来果然下起了雨,没有带雨具的人都挨了淋。

在苏格拉底探索大自然的过程中,以智者阿那克撒哥拉对其影响最大,他对苏格拉底的



一些疑问给予了解答。

阿那克撒哥拉主张“万物种子”论,并认为“理性”是万物建立秩序,也是万物存在的原因。

苏格拉底从阿氏的书中发掘到“万物生存的原因”,觉得异常高兴。当他继续阅读此书时,又发掘到不少问题,他以为已经找到通往他所追求的独特世界的道路。

所谓“理性是维持万物秩序的原因”,也就是说理性规定了万物存在的地点,让万物处于最适当的位置,也让行星按照一定的法则运行。人类若想发现每一种东西如何诞生、如何消灭、如何存在……就必须搞清其他东西对它的影响,或是它本身对别的东西的影响。能够如此,才能知道究竟在何种状态下建立良好的秩序。

在苏格拉底看来,阿那克撒哥拉的学说,等于告诉了他宇宙万物的法则,而人类必须做的就是考察人类本身及其他与人类有关的事物。

苏格拉底期待进一步了解大自然,明了天体的运动。他希望知道太阳、月亮及其他星球如何移动,它们之间是否能彼此影响。但是,阿那克撒哥拉一直强调,所有物体都基于理性而



建立秩序,它们现在的情形,就是最好的情形。换句话说,他只指出“理性”是万物存在的法则,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如何运用理性去解释宇宙和人类的真正问题。

阿那克撒哥拉的理论曾使苏格拉底以为找到了真理,但是当他进一步研究后,他失望了,他不满足了,他只好承认自己毫无研究自然科学的头脑,又去寻找另一条道路。此后,苏格拉底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哲学研究之中。



## 苏格拉底的“爱情观”

一天,亚里斯托顿在路上碰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那天洗过澡,脚上还穿了鞋,这些在他都不是常有的事。亚里斯托顿问他到哪里去,打扮得这样漂亮。他回答说:“到阿加东家里去吃晚饭。昨天他庆祝胜利,请我我没去,怕的是人太多,但是答应了他今天去。我穿戴整齐,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阿加东是一个漂亮少年,去他那里就得讲究一点。喂,你和我一道去,做一个不速之客,好不好?”亚里斯托顿说:“遵命。”苏格拉底说:“好极了,跟我一道走。这样一来就可以应验一句谚语了:‘逢到好人的宴会,好人不请自来。’”

阿加东是雅典的一位诗人,他的一个悲剧获了头奖,自然想庆祝一番。他请了一些要好的朋友,举行“会饮”。所谓“会饮”是古代希腊



的一种礼节,即有庆祝的意味,又有的是酬神的仪式。仪式举行之后,宾客开始饮酒,通常有乐伎助兴。不过我们要讲的这次“会饮”以讨论哲学问题代替寻常的娱乐节目。

苏格拉底和亚里斯托顿结伴而行。可是在路上苏格拉底想一个问题,一个人落在后面凝神默想。等亚里斯托顿来到阿加东家的大门口时,回头一看,根本没有苏格拉底的影子!阿加东派仆人去,见他挺直地站在邻家的门楼下,进入了“冥想”状态。等宴会过了一半时,苏格拉底才姗姗入座。阿加东冲他喊道:“这里,苏格拉底,请坐在我旁边,好让我挨到你,就可以沾到你在隔壁门楼下所发现的智慧。你显然发现到你所找的道理,把它抓住了,若不然,你还不会来。”苏格拉底坐下来,说:“如果智慧能像一杯水,通过一根羊毛,就引到一个空杯里去,如果两个人只要挨着坐,智慧就从盈满的人流到空虚的人,那是多么好的事,阿加东!如果智慧是如此,我就该把坐在你旁边这件事看得非常珍贵,因为你的许多智慧就会流注到我身上来。我的智慧是很浅薄的,像梦一样,真伪尚待





商讨；而你的智慧却是光辉灿烂、无穷发展的，自从幼年起，它就蓬勃焕发；就是在前天，3万希腊人已经替你的智慧的表现作了见证。”阿加东说：“苏格拉底，你在嘲笑人。关于我们的智慧问题，我们等一会儿请酒神狄俄尼索斯做判官，凭他判断谁优谁劣。现在你最好先吃晚饭。”

于是苏格拉底入了座，和其他客人们一起用过晚饭。他们举杯敬神，唱敬神的歌，举行了其他例行的仪式，便开始饮酒。有人提议趁着这个机会，礼赞爱神，消遣这次聚会的时光。大家一致赞同这个建议。

斐德若首先发言：“爱神是一个伟大的神，在人与神之中都是最神奇的。爱神不仅是最古老的，而且是人类最高幸福的来源。如果叫一个城邦或是一个军队全由情人和爱人组成，它就会有一种不能再好的统治，人人都会互相竞争，避免羞耻，趋求荣誉。这种人们如果并肩作战，只要很小的一支队伍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接着说话的是泡赛尼阿斯，他说：“我们今天赞颂爱神，但须知爱神并非一种。我们应该



把高尚的爱和凡俗的爱区别开来。凡俗的爱是两个肉体的互相吸引,而高尚的爱则是两个灵魂的息息相通。当青春之花衰减了的时候,凡俗的肉体之爱就会消失,而高尚的灵魂之爱是永恒不渝的。”

轮到了阿里斯托芬,他提出一个颇为奇异的新理论。“在很久以前”,他告诉我们,“两种性别结合在一个身体里,这种人的形体是一个圆团,有4只手、4只脚和两副面孔。它行动时把脚伸直向前翻滚,8只手脚一齐动,所以翻滚得很快。这种男女合体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们的野心也是毫无限制的。它们想飞上天去,和神们打仗。这时,宙斯想出了个巧妙的计划。‘让我们把它们劈成两半’,宙斯说,‘这样它们的力量就削弱一半,而我们得到的供品则是双倍的。’于是, he 把它们劈为两半,分成了男人和女人。从那以后,曾经是一个整体的这两个部分渴望着重新合为一体。这种两性重聚的渴望就是我们所说的爱。”

阿里斯托芬说完之后,阿加东也讲了他的看法:“爱神在本质上原来就有高尚的美和高尚



的善,后来一切人神之间有同样的优美品德,都由爱神种下善因。现在我想到两行诗,正可以表现我的意思:

人世间的和平,  
海洋上的风平浪静;  
狂风的安息,  
以及一切痛苦后的甜睡,  
这都是爱神的成就。”

在这些关于爱神的颂词之后,客人们请苏格拉底发言。苏格拉底谦虚地说:“听了这样的高论之后,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了。我的无知怎么能与这样的智慧相比呢?”其实,苏格拉底的谦虚是带有讽刺意味的。他以自己的“无知”对他们的“智慧”提出反驳,然后才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苏格拉底说:“‘爱’是人类灵魂对神圣的美的追求。在爱的人不仅渴望找到美,而且渴望创造美,使美永世长存,在不免一死的人的身体中播下不朽的种子。这就是为什么异性相爱——复制他们自己,从而延长生命使之永恒。这也是为什么父母爱他们的孩子。对爱孩子的



父母来说,他们创造的不仅是孩子,而且是对美的永恒追求的合作者和继承人。

“那么,我们试图通过爱而使其永恒的‘美’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智慧、美德、荣誉、正义、勇敢和忠诚。一句话,美就是真理。真理直接引导我们走向神的道路。”

苏格拉底说完话,在场的人都赞赏他说得好,接着大家又继续饮酒,一直持续到深夜。欢宴者们睡的睡,走的走。天快亮时,只剩下阿加东、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三人还在喝酒,一个大杯子在他们手里传来传去。苏格拉底在和他们辩论,其实他们两人都只是模模糊糊地听,不久就开始打盹了。苏格拉底见他们睡得很舒服,就起身走出去,像平常那样,到雅典市民中去传播智慧。

## “神说错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百思不得其解而别人又无法代为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苦恼的根源。然而每个人的情形又不尽相同,有些人的苦闷时间很长,有些人则很短。苏格拉底可能在三四十岁时遇到过苦闷的煎熬。

苏格拉底想尽办法才找到智者阿那克撒哥拉,并对他抱以无限的期望,但他终究无法解答苏格拉底的所有疑惑。苏格拉底没有真正的老师,他必须在黑暗中独自摸索,靠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找寻真相,找寻自己的哲学之路。

苏格拉底凭自己的刻苦自学,通晓了当时希腊各派的哲学。他虽然相貌丑陋,却有非凡的智慧和辩才。他鼓起三寸如簧之舌进行滔滔雄辩,常能使对手倾倒。由于他知识渊博、思想敏锐、擅长言辩,所以很快在雅典取得了相当大



的名声,拥有了自己的小圈子。聚集在他身边的一批青年,奉他为追求知识的领袖。其中一个叫凯勒丰的学生,更是对苏格拉底佩服得五体投地。凯勒丰为了知道是否有人比自己的这位老师更有智慧,特地跑到全希腊最著名的特尔菲神庙去询问,请求太阳神阿波罗回答他一个问题:“世界上是否还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结果太阳神降下一条神谕:“索福克利斯(著名悲剧家)很聪明,幼里皮底斯(悲剧家)更聪明,但万人之中,苏格拉底最聪明。”凯勒丰非常高兴,带着这个神谕回到雅典,苏格拉底因此而名声更隆。

当苏格拉底知道这个“神谕”后非常吃惊,感到难以理解。因为他一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智慧,但又认为太阳神阿波罗不会撒谎。怎么办呢?他决定进行调查访问,想找到一个比自己更聪明的人,以便证明“神说错了”。他首先访问了一位政治家,别人说这位政治家很聪明,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经过一番交谈,结果发现“那些名声显赫的人正好是极其愚蠢的,而另外一些地位较低的人倒显得聪明些”。



这种评价自然招来这位政治家的怨恨。接着苏格拉底又去拜访了诗人，有“悲剧诗人、颂酒神的诗人及其他各种诗人”，他从这些诗人的作品中选出一些段落，问他们是什么意思，诗人们解释得非常糟糕。于是苏格拉底感慨地说：“诗人的创作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与灵感，他们就像那些占卜吉凶的人一样，能够说出一些好东西，但不理解它们的意义。”于是，他又离开了诗人。心想自己比他们还好一些，因为起码还知道自己的无知。最后他又访问了工匠，苏格拉底相信他们有实际经验和本领。确实，这些工匠懂得很多，相当聪明，然而他们由于自己的一技之长从而就自以为对其他事情都有了充分的了解，这种浮夸掩盖了他们的智慧。苏格拉底说：“我到处奔波，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最后发现那个神谕是驳不倒的。”

于是他不得不认真思考神的话。他自以为无知，而神却说他最聪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思考的结果是：“只有神才是最智慧的，他的话说明人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他并不是在说我苏格拉底什么，而只是借我的名字说明这



样的观点和意思：一个懂得自己的智慧没有多少价值的人，就是最聪明的人。我知道自己没有智慧，这是高于别人的地方。”人不如我，我不如神，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结论。

苏格拉底的名声本来就不太好，现在由于他又得罪了一批人而变得更坏了。在人们的眼里，他简直是个祸害。这种危险的敌视情绪通过一部喜剧而充分表现出来。公元前 423 年，雅典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云》在雅典上演，剧中的苏格拉底被描绘成一个伤风败俗、不敬神王宙斯、专门唆使青年干坏事的无赖。这个喜剧作家让扮演苏格拉底的演员戴着和苏格拉底本人几乎一模一样的面具出场，前来观剧的苏格拉底没有思想准备，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过从甚密，不一定想把朋友置于死地。但他留恋过去的“黄金时代”，主张复古，对当时十分活跃的智者学派深恶痛绝，就不加区别地把苏格拉底作为他们的代表面进行无情的攻击，以便恢复简单信仰，禁绝思想。对苏格拉底来说，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甚至过了 24 年，在审判苏格拉底的时候





候,他的政敌还把这部喜剧当做被告的一项重要罪证。

## 勇敢的苏格拉底

雅典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雅典的强大和咄咄逼人的霸权引起了另一个希腊城邦斯巴达的戒惧和忌恨,导致了双方矛盾的激化,希腊世界进入了大动乱、大震荡时期。作为雅典公民,苏格拉底同其他公民一样被卷入了动乱。公元前432年,位于爱琴海北岸的波提底亚在科林斯(雅典邻国)的唆使下似乎有背叛雅典的企图,雅典于是发兵围攻,苦战两年,终于让对手膺服,这次战争导致了次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全面爆发。37岁的苏格拉底参加了波提底亚战役,并且有极其出色的表现。他吃苦耐劳,坚定勇敢。在波提底亚附近的一次战斗中,亚西比德(古代雅典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身负重伤,被一群敌人围在当中。苏格拉底奋不顾身,杀开一条血路闯进敌群,带着他冲了



出来,救了他的性命,还抢回了武器。后来,亚西比德因功受赏时说,应当把这个奖牌授予苏格拉底。但被苏格拉底拒绝。亚西比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那次战役之后,我从指挥官那里获奖,其实,苏格拉底也应该受到奖赏才对。因为他没有丢弃受伤的我,而是解救了我,并且还将我的武器一起带回。不管你们是否将责难我,或者说我撒谎,我真的曾经向指挥官建议应该授奖牌于苏格拉底,但因为我是贵族,所以指挥官给我奖赏。而且苏格拉底也非常赞成我获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得奖。”

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苏格拉底的高风亮节及其对名利之淡泊。

公元前423年,46岁的苏格拉底又随拉该斯将军参加了戴琉姆会战。此役雅典全失以往的威风,被波提底亚人打得惨败。官兵们来不及抢救伤员就急急忙忙逃离战场。据说在撤退途中,苏格拉底表现得比拉该斯将军还要镇静,仍和平常一样腆胸叠肚,斜视左右地阔步而行。事后拉该斯将军这样评价他:“苏格拉底在任何



时候,任何地点都知道要尊敬自己的父亲和祖国。如果所有士兵都像苏格拉底那样勇敢,雅典就不会失去自己的光荣,大撤退的事就根本不会发生。”

在戴琉姆会战中,与苏格拉底并肩作战的还有亚西比德,他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苏格拉底在战场上的表现:

“各位,了解戴琉姆的派遣军将要撤退时苏格拉底所采取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那时,我骑着马,那些没有马的就徒步而行,因此我必须等到军队全部疏散后才能撤退。这时,我看到苏格拉底同拉该斯两人一起行动,我叫他们鼓起勇气,继续奋斗下去,我绝不会把他们丢弃的。在此战役中,我能够比在波提底亚包围战中更详细地观察了苏格拉底。我充分了解到,他比拉该斯优秀得多。当时,他非常镇定地观察敌军动向,以极其冷静的神态行走,任何看到他这种神采的人,都会觉得与这个人一起行动非常安全,因为他一定会很勇敢地保护自己。”就在这次战役中,色诺芬从马背上摔下来,满身血污,不能动弹,苏格拉底跑了过去,把他背起

来,从容不迫地抵挡着追击的敌人,把色诺芬救了出来,色诺芬后来成为苏格拉底的忠实学生,成为一名著名的军事家和史学家。

为了感谢救命之恩,色诺芬后来写了著名的《苏格拉底回忆录》,表达了对先生的敬仰和爱戴之情。该书共四卷,写于不同时期。第二卷的前两章是反驳原告的指控,为苏格拉底辩护,人家说苏格拉底不敬神,他说苏格拉底是敬神的。这样的辩护实在是太笨了。从第一卷第三章第九节开始,全部是以苏格拉底为中心的对话体,涉及他的言行、理想和情操等等。这些记载是否全部属实,我们不能肯定。不过,色诺芬是个军人,不擅长文墨,缺乏像柏拉图那样的想像力,却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情节。

公元前422年,已经48岁的苏格拉底最后一次服军役,参加了与斯巴达人在安菲波里城展开的一场血战。这一仗极其残酷,双方的主帅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后来,在法庭上自我辩护时,苏格拉底说:

“各位雅典人,我曾被你们选中去参加波提底亚包围战、戴琉姆会战和安菲波里之战。当



指挥官命令我守护某个据点时,我绝不会比别人逊色,为了保卫和守护指挥官所配置给我的岗位,我是不惜牺牲生命的……”

苏格拉底不但作战勇敢,而且意志坚强。曾和他一起参战的一个人回忆说,有一次他们部队的供给被切断了,士兵们不得不很长时间忍饥挨饿。后来许多人都坚持不住了,而苏格拉底却步履坚定,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他忍耐寒冷的能力也是惊人的。曾有一个严霜的日子,所有人不是躲在屋里,就是穿着很多的衣服,紧紧地把自己裹起来,把脚包上毛毯。这时只有苏格拉底赤脚站在冰上,穿着平时的衣服,他比穿着鞋的士兵走得还要好。

战争并没有给雅典带来任何好处,而战事刚起时雅典就发生了两次极为严重的瘟疫。据记载,当时的人“像苍蝇一样死亡着”,就连伯里克利也未能幸免,于公元前429年染疫而亡,以他为标志的一个黄金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战争的动乱和瘟疫的流行使得城里违法乱纪的行为空前增加。因为“没有一个人预料他会活到受审判或处罚的时候”。然而就是在这种时



候,苏格拉底也没有放弃他的哲学使命,即使在打仗时,他也经常陷入出神的沉思。从波提底亚回到雅典的第二天,他就找到自己的朋友和学生,打听城里的“哲学状况与青年人的状况”。从柏拉图的许多对话来看,种种伦理和政治问题大概是他这一阶段关心的焦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对话大多都是以公元前 421 年签订 50 年休战和约之后,苏格拉底与别人的讨论为原材料的。

## 坚持正义 谴责暴政

尽管苏格拉底为人正直,战斗勇敢,矢志报国,却由于身处逆境而甘愿做一名社会道德教师,不愿意担任国家公职。他清醒地意识到,在雅典这个虽有民主但无正义可言的社会里,一个诚实地反对一切非法行为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他认为,要想为正义而斗争,要想活下去,就只能从事私人活动,不能走上公共职位。所以,他虽然活了 70 岁,只是在晚年才参加了两次政治活动。

第一次是抵制对 8 将军的非法审判。公元前 406 年,雅典在一次海战中击败了斯巴达水师,以 15 艘战船的轻微代价使敌方损失了 70 艘战船。但不幸的是,战斗刚一结束,巨大的风浪使 25 艘雅典三列桨战船沉没,船上的水手全部遇难。狂风大作,巨浪滔天,使打捞水手的尸





体和收埋在战斗中牺牲的士兵的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尽管如此,雅典仍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确定无疑的。民主派的将军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凯旋归来。不料等待着他们的,却是冷酷无情的审判。死难者的家属责怪他们玩忽职守没有尽力去完成掩埋死者的神圣任务,要求审判他们。对于这次胜利,贵族派本来就心怀嫉妒,便利用这些家属的情绪进行煽动。一个名叫加里纳斯的政客装做十分悲痛的样子,含着挤出来的眼泪,火上加油,尽量夸大将军们的罪行,竟提议将8人全部判处死刑。他不容被告申辩,也不让群众冷静思考,蛮横地要求立即表决,并且违反惯例,不是对每个人的死刑判决单独表决,而是对8个人的判决一次表决,这是极不公正的。当时苏格拉底是500人议会的成员,按当时的规定,500人议会分成10组,每组50人,轮流当主席团,每天一人值班,称为主席团总主席。案件提交法庭的文件和手续要由主席团审查合法,才交法庭议决。案件提交法庭时,由500人议会主席团总主席在法庭上当主席。审议8位将军案那天,正值苏格拉底以主



席团总主席的资格在法庭上当主席。他拒绝把这个提议提交法庭议决。他说,不是对每个人单独审判而是同时审判他们,这是违反法律的。苏格拉底认为,8位将军之所以未能安置好遗体纯粹是因为风浪过大,而非他们不尽职,因而在法庭上不能处死他们。可是,群众已被这伙人煽动起来,一些持不同意见的议员也在压力下屈从了。这时身为主席的苏格拉底眼见已经很难说服群众,改变局势,便拒绝参加表决,于是他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加里纳斯一伙以及被他们蒙蔽、操纵的群众辱骂他、威胁他,扬言要逮捕和审判他。苏格拉底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平静而又坚定地回答说:“我早就下了决心,誓为法律和正义而斗争。当你们办事不公正的时候,我不能和你们站在一起,虽然你们是多数。遵守誓言比违反正义以满足群众的要求、或在威逼之下委曲求全更为重要。”对手们情知理亏,见他态度坚决,对他也无可奈何。可惜按规定苏格拉底只值班一天,第二天由另一人当总主席,那人屈从压力,终使8位将军含冤而死。以上就是他反对所谓“公民大会决议”的真相。



由此可以看到,如果他真的反对民主政治,那么在这次事件中,就会和贵族派抱成一团,而不会冒这样大的政治风险为 8 将军鸣不平了。

第二次是反对克里底亚之流的血腥统治。公元前 405 年 9 月羊河一战,雅典惨败,160 多只战船被俘,三四千官兵被处死,民主派的力量大大削弱。次年,他们已经无力再战,就派使臣塞拉米尼前往斯巴达和斯巴达将领来山德谈判。塞拉米尼在斯巴达待了 3 个月。在此期间,雅典已经断粮,不少人饿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接受对方提出的苛刻条件,同意拆除长墙和比雷埃夫斯的防御工事,让被驱逐的贵族寡头派返回雅典等。公元前 404 年 4 月,来山德的船队驶进比雷埃夫斯,他的部队开始在欢乐的乐声中拆除长墙。延续了 27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告终。

在返回雅典的这批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克里底亚的人(前 460—前 403)。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雅典的诗人、演说家和哲学家,也是一个厚颜无耻之徒。他倚仗斯巴达的武力支持,纠合了 30 个贵族寡头分子,在制定新法的幌子



下,篡夺了国家权力。由于这伙人劣迹昭著,不得人心,被称为“三十暴君”(前 404—前 403),克里底亚便成了他们的大头目。

他们统治的时间虽不算长,坏事却干了不少。第一,利用自己的心腹拼凑了一个 500 人议会,把过去属于人民的审判权夺了过来。第二,把公民人数减少到 4000,其中的 1000 名骑士是雅典最富的人,他们是克里底亚之流的社会支柱。与此同时,多数人却丧失了公民权,从而也就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设立了相当于警察局的“十一人团”,任命凶残的萨提路斯为首领。第四,杀人越货,实行强盗式的统治。在短短的 8 个月中,就驱逐 5000 人,杀了 1500 人。

被杀者大体上有这样几类:一是著名民主派人士。二是温和寡头派分子,例如尼西拉托斯(尼西阿斯之子)和塞拉米尼等。他们反对民主政治,也反对克里底亚之流的倒行逆施。塞拉米尼本是三十暴君之一,由于时常发表“有害之论”而遭受嫉恨。有一天在 500 人议会上,他又怀着正义感抨击暴君,说雅典的尸体在逐日增加。克里底亚早想把他除掉,于是就把他的



名字从公民名单中勾销,并且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就宣布将他处死。萨提路斯当场把他拖下讲台,押出会场。当塞拉米尼喝下毒酒的时候,故意在碗底留下一滴,愤怒地说:“这滴死亡之酒留给克里底亚去喝吧!”三是不能参与政治、但有一定资财的外邦人。例如,替人撰写演说词的吕西阿斯和他的兄弟波利马卡斯合作经营了一间赚钱的制盾作坊,便招来杀身之祸,他们的作坊也被鲸吞。四是真正的坏人,但为数很少。五是富有的公民。在萨拉密斯岛,有一个名叫莱昂的富人,克里底亚贪图他的钱财,决定把他杀掉。于是想让苏格拉底带领一个小分队(四人)把他抓来。那四人遵命而去,苏格拉底却表示不能合作,因为他不愿意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柏拉图晚年回忆此事时写道:“他们的目的是想把苏格拉底拉进他们的政府,但是他拒绝了。宁可承受一切恶果也不愿成为他们的同伙去参与他们的恶劣行径。”

克里底亚见苏格拉底竟敢公然抗命,气得咬牙切齿。但是苏格拉底并不害怕,他和往常一样,大部分时间仍然用来和青年们交往。一



天,当他谈到克里底亚的时候,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对青年们说:“一个牛倌,把牲口养得又瘦又弱,却不准别人说他是坏牛倌,真叫人感到奇怪。一个政治家,搞得公民堕落,人数减少,却不以为耻,不以为自己是个很坏的政治家,更使人觉得奇怪!”

克里底亚既专横跋扈,又做贼心虚,立刻把他召去,提醒他要“奉公守法”,不要再和青年人接触了,随手把一纸命令交给苏格拉底。他仔细看了一遍,发现措词含糊,毫无道理,于是问道:“请规定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以便让我知道究竟多少岁以下的人算是青年?”

“30岁以下。今后不准再和这样的人谈话!”

“我明白了。不过,要是我想到店铺去买点东西,也不能向不满30岁的人问价钱吗?”

“唔,可以!”克里底亚不耐烦地说。

“那么,我还想知道,如果遇到一个青年,向我打听我所知道的事,比如说,克里底亚住在什么地方,我也不能回答吗?”

“……”克里底亚无言以对,气得脸红筋涨,



已经十分恼怒了。

面对如此残暴的人,苏格拉底毫不示弱,敢于针锋相对,为什么他还能活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在上面曾提到,克里底亚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如果把自己的老师无故杀死,只会更败坏自己已经很坏的名声;第二,苏格拉底没有群众基础,虽然抨击暴政,并不会在政治上对克里底亚之流构成严重威胁;第三,苏格拉底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就是把他杀了,从他身上能榨出几滴油水?第四,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忠实门生,也是克里底亚的亲戚,当时已经20多岁,他的劝告可能会对暴君起点作用;第五,“三十暴君”好景不长,很快垮台。不然的话,苏格拉底可能就轮不到被民主派去处死了。

这就是苏格拉底,勇敢而坚定,临危不惧,宁死不屈,心中只有公平和正义,为反暴政,连自己的性命也差点送掉。用色诺芬的话讲,他在各方面都堪称雅典人的典范。然而,在人吃人的社会里,这样的人终于悲惨地死去了。



##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

苏格拉底生得很丑，死得很美。2000 多年来，他的死被传为佳话，这绝不是偶然的。

就在“三十暴君”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时候，被迫逃亡在外的民主派分子也在积极准备行动。民主派领袖拉绪布罗等，在底比斯同情者的支持下，带领一支只有 70 人的小部队进入阿提加，占领菲尔要塞，继而南下，控制了比雷埃夫斯港，这时部队已有 1000 多人。敌人倾巢来犯，但很快就被击退，70 余人被打死，包括克里底亚在内。

傀儡政权垮台，斯巴达不会甘心，决定立即出兵，再次干涉雅典内政。来山德在厄留息斯集中了一支大军，李比斯指挥 40 只战船封锁比雷埃夫斯，切断了海上供应，使之成为一个饥饿之港。坚守在这里的民主派官兵处境险恶，岌





岌可危。然而斯巴达的权力之争却使他们转危为安。几年来,来山德野心勃勃,他的权力和影响与日俱增。当局担心此人权力过大,不好控制,就决定把军权交给鲍桑尼亚斯。这个斯巴达王不愿意再打下去,竭力主张雅典二派捐弃旧怨,言归于好。这样,民主派就顺利地回到雅典。这是公元前403年5月的事。

民主派东山再起,重获政权,由于创深痛巨,仇恨未消,克里底亚已被打死,他们就把满腔仇恨发泄在苏格拉底身上。他们认为,克里底亚穷凶极恶,杀人如麻,完全是被苏格拉底教坏的;一年以前的贵族寡头派政变,使民主派死的死,逃的逃,苏格拉底却待在雅典,安然无恙,如果再来一次政变,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公众舆论也要求追究这次政变的原因,并且认定招来麻烦、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就是这个短小结实、整天研究节制和正义问题的小老头。苏格拉底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受审的。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发生在公元前399年春天,原告有三个,其一是一个不很出名的悲剧家麦利都(此人在“三十暴君”统治时期执行了苏



格拉底拒绝执行的对莱昂的非法逮捕),其二是在政治上极其活跃的皮匠安尼都,其三是鼓动家李康。他们三人在规定的地点贴出一张状子,起诉状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告发苏格拉底,他不承认国家所规定的众神,引入其他的神,并且蛊惑青年犯罪,我们要求将他判处死刑,以整肃国法。”

这张诉状指控苏格拉底的罪名主要是两条:第一,他不敬雅典的神而引进新神;第二,败坏青年。苏格拉底的弟子看到这样的控告之后,有的进行了申辩。因为事实上,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几乎个个都不相信国神,甚至有人否认神的存在;而苏格拉底则没有否认神的存在,并且还常常劝人们敬神、按礼节膜拜神明。至于说他“引入新神”,更是荒诞!控告者所依据的是苏格拉底自称受某种无形的内在声音所指导。但如果这就叫“僭立新神”的话,也未免太牵强了。说他败坏青年,也是人们的误解。尽管原告的理由并不充分,但雅典当局还是决定立案审理。

这是5月份一个晴朗的早晨,天刚蒙蒙亮,



雅典人就起身了,因为要审理一件重大的案子,不少人想去当陪审员。500人幸运地抽签入选,负责审理苏格拉底案件。因为他被控犯有渎神罪,此案非同一般。开庭了,由抽签法选出的王者执政官主持审判,人数众多的陪审员一一在铺着席子的长凳上就坐,原告和被告坐在和他们对面的地台上。在围栏外边站着很多听众。苏格拉底的弟子和朋友差不多都来了。你看,这边是柏拉图和他的兄弟埃地曼图斯;那边是克里同和他的儿子克里托布罗斯,还有西米亚斯、塞比斯和英俊的费多;赫尔莫戈尼斯已经挤到最前边,他想尽量和被告靠近一点。

传令官让大家安静下来,宣布开始献祭和祈祷。接着是一名法庭书吏宣读诉状和申辩词。然后王者执政官请原告代表上台。麦利都首先发言,主张重判。苏格拉底有权为自己辩护,但他一言不发。“为什么不说话,苏格拉底?”赫尔莫戈尼斯有点着急了。苏格拉底解释说,第一,我常常思考正确和谬误这样的问题,并且力求在行动中坚持正义,避免谬误。我一生是这样做的,这就是最好的辩护;第二,我已



经老了,再活下去,就会耳聋眼瞎,行动迟缓,不如别人。如被非法处死,则杀我之人必将蒙羞后世,我将永远受人怀念;第三,我心中的“灵异”禁止我进行辩护。这就是说,死比活好,这是神的意志。

安尼都见苏格拉底不起来为自己申辩,便走上讲坛。这人属于温和派,是个有钱的皮革商,曾经和拉绪布罗等一起,参加过推翻“三十暴君”的斗争,加上能言善辩,所以政治上有一定影响。在克里底亚发动政变之际,他被逐出雅典,财产损失殆尽。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坚持让儿子学习经商,以便将来恢复家产。谁知这个儿子根本不想做商人,却愿意和苏格拉底交往。苏格拉底见他聪明伶俐,很有头脑,也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这么一来,就把他的父亲得罪了。安尼都本来就讨厌苏格拉底,现在,厌恶变成了仇恨,所以他是带着个人恩怨提出控告的。

他首先用威胁的口吻对陪审团说:“如果你们判他无罪,将他开释,苏格拉底一伙就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嚣张。这样的判决肯定是不受欢迎



的。”接着他开始列举被告的罪状。

第一条,苏格拉底要儿子不敬长辈。他说,如果儿子能让陪审团相信父亲确实已经发狂,法律就应当允许儿子把父亲送进监狱。

第二条,苏格拉底说,朋友之间只有爱慕和尊重之情是不够的,友谊应当促进智力的发展。懂得什么是正直行为并能向别人说明的人,才是惟一值得尊敬的人。言下之意,只有他才是这种惟一值得尊敬的人。

第三条,苏格拉底利用荷马等著名诗人的著名诗句鼓励反民主情绪,败坏青年道德,把他的学生例如克里底亚等人变成罪犯和暴徒,给国家造成极大危害。

第四条,苏格拉底“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且宣传其他的新神”。

第五条,苏格拉底反对现行制度。他说:用抽签法选举公职人员是愚蠢可笑的。

安尼都说完之后,洋洋得意地走下讲台。这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苏格拉底终于开口说话了。他并不想为自己辩护,而是以一个社会道德教师的身份,企图说服陪审团。他的演说



既是劝人从善,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行为的简单总结,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这样三点:

第一,坚持正义,不畏强暴。他说:在“三十暴君”的统治时期,有一天,克里底亚把我召到圆顶厅,命令我们到萨拉密斯岛把莱昂捉来处死。他们常常下达这样的命令,整天忙于设法害人,以诛除异己为乐事。那时,我一点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我最怕的是去做不正当的事情。他们的权力虽大,但绝不能强迫我去为非作歹。所以,那四个人去了,我却回到家里。如果不是他们很快就被推翻,我可能为了此事而被处死。

第二,劝人从善,培养美德。他说:由于献身于神的缘故,我早就一贫如洗了。除对神的服役外,我什么也不做。只是要说服你们,不论老少,都不要老是想着你们的人身和财产,而是要注意灵魂的改善。美德并不是用金钱能买来的,金钱和人的公私方面的好东西却是从美德产生的。这就是我的学说。如果这也算是败坏青年的学说,那我就是一个坏人。雅典人啊,你们可以开释我或者把我处死。但是不论你们怎



样做,都要懂得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行为的。即使一死再死,我也不会改变。

第三,自比虻蝇,爱国爱民。他说:我好比是一种虻蝇,这个国家好比一头伟大高贵的牲口。就因为它很大,所以动作迟缓,需要刺它几下,才能使它活跃起来。我所以总是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并且责备你们。你们是不会容易找到另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的。所以我劝你们不要定我的罪,因为我是神赐给你们礼物,害怕你们由于把我处死而对神犯罪。

我们不必再花笔墨重述苏格拉底的申辩了。对于那些已经糊里糊涂的陪审员们来说,苏格拉底无疑是亵渎了他们的神,无疑腐化了他们的青少年,他们不肯相信苏格拉底是神赐给他们的一件好礼物,更不愿听苏格拉底对他们将受惩罚的预言,他们可能倒是宁可相信能够处死这样一位丑陋的老人一定能显示他们对城邦的一片忠心。于是他们顺着早已不能酿出什么好酒的酒神,判处了他的死刑。于是苏格拉底只能对他们表达一种来世的不可知论:“死别的时辰就要到了,我将赴死,你们还活下去,



谁的下场会好一些,只有神才知道。”就此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申辩。当时在场的弟子阿波罗多伤心地对苏格拉底说:“可是,苏格拉底,看到你这样不公正地被处死,真让我们不能忍受。”苏格拉底拍拍他的脑袋,微笑着说:“亲爱的阿波罗多,难道你希望看到我公正地被处死,而不是不公正地被处死吗?”

根据法律,被告有权违反原告的建议,提出一种较轻的处罚,例如罚款、禁闭等等。可是苏格拉底理直气壮地认为他的言行不属于犯罪,而是有利于社会。如果一定要他提议,他认为应当让他终生在圆顶厅享受免费餐,只有这样,才算公正。陪审团向他建议,既然处在被告地位,就自认一种刑罚吧。没想到,他却开了一个玩笑,只同意交一个明那(古希腊重量单位)的罚款。这一下把陪审团给激怒了。苏格拉底的弟子见状赶紧提出愿交 30 明那的罚款,但已于事无补了。原本同意无罪释放他的 80 个人,现在都投票赞成判处死刑了。当时参加审判的陪审员是 500 人,投票结果是 280:220 判决苏格拉底有罪。经过量刑,最后判决是死刑。





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注定不为雅典所容,而作为一个人他被判处死刑却来得多少有些偶然。姑且不论在审判前后他可以逃走,因为这与他人格格不入。在投票表决时,那种中间有个突轴的筹码(代表有罪)只比中间有个圆孔的那种(代表无罪)多 60 个,那么只要从前者中减去 30 个,苏格拉底就不会被判有罪,更不会被处死了。有两种可能我们可以考虑。第一,500 名陪审员是由更多的 30 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抽签产生的,如果碰巧有更多的同情苏格拉底或较为宽怀的人抽中,苏格拉底则无疑可以无罪释放。第二,如果苏格拉底的朋友让珊蒂柏带着年幼的孩子来法庭哭天喊地一场,达到减少 30 个有罪票的可能也是极大的,须知在女人的眼泪面前人们是多么容易改变主张。这一切当然都未发生,而这也正是苏格拉底或雅典人的悲剧之所在。



## 哲人之死

在通常的情况下,判决后便立即执行。但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苏格拉底没有被马上处死。原来,每逢塔尔格利翁月(相当现在的5月),雅典都要派三列桨的圣船“培拉路斯”载着人员和祭品前往提洛斯岛的阿波罗神庙朝圣,往返时间是30天,在这个特定时期内,不得处决犯人。苏格拉底被判决之日适逢圣船起航之时,所以多活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克里同等人由于经常探狱,居然买通了看守,制定好越狱计划,打算帮助这个死囚逃到色萨利去。不料苏格拉底坚决拒绝,表示不能从命。因为他宁可服从法律,承受国家给予他的严厉处罚,而不愿意为了苟全性命而丧失节操。

30天后,圣船返回。当苏格拉底得知“十一人团”(雅典的狱吏会)决定明晚就要把他处



死的消息之后,就打发妻子珊蒂柏带领孩子们离开牢房,自己却与克里同等人侃侃而谈,讲了一番关于灵魂永生的问题。他说:死或者是一场没有梦的睡眠,或者是灵魂离开肉体,移居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如果一个人死后能见到荷马等人,他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放弃呢?在那个世界里,人们不会因为一个人提出了问题就把他处死的。他就是这样坦然地度过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

柏拉图在他的《费多篇》中通过费多和埃希克拉特(苏格拉底的朋友)谈话的形式,记载了苏格拉底临终前的一些轶事,译在下面,以飨读者。

费多说道:开头,我和另外几个人天天都去探望苏格拉底,渐渐地就成为一种习惯了,直到他死去的那天为止。我们通常于拂晓的时候就在他曾经受审的那个法庭门口聚齐,因为那个法庭就在监狱附近。监狱的门迟迟不开,我们只好等在外面聊天,直到开门放我们进去。一进大门,我们就奔向苏格拉底的牢房,差不多整天都和他待在一起。一天晚上,当我们离开监



狱的时候，听说圣船已经从提洛斯岛回来了。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在平时碰头的那个地方聚齐了。我们一进大门，经常领我们进去的那个狱卒就迎了出来。他让我们等着，说听到招呼之后才能进去。他说，“十一人团”正在卸除苏格拉底的脚镣，并且命令今晚将 he 处决。过了一會兒，他告诉我们可以进去了。

我们走进牢房，见到了刚刚除去脚镣的苏格拉底。珊蒂柏搂着孩子坐在他的身边。她一看到我们，就失声痛哭起来，并且泣不成声地说：“苏格拉底哟，你将永远不能再和你的朋友在一起谈话了。这是最后一次啦！”苏格拉底瞅了瞅克里同说：“找人把她带回家去吧！”克里同就吩咐几个奴隶把这个嚎啕大哭、捶胸顿足的女人带走了。这时候，克里同问道：“请告诉我，苏格拉底，关于你的孩子们，或者是其他的后事，你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或在座的其他任何一位吗？你知道，我们是愿意为你效劳的。”“只有……”他说，“只有我经常对你们说过的那些话，克里同，此外没有别的事了。务请诸位谨持节操。如果诸位不能自制，或者不能像我教



导的那样去生活。那么,不论你们现在对我许下多少诺言,你们也拯救不了我的灵魂,对不起我的在天之灵!”

克里同道:“我们一定会努力去做。那么我们应如何埋葬你呢?”苏格拉底不失以往的风度回答:“随你们的便好了,只要你们抬得动我(因他身体肥胖,肚皮很大,所以这么说),不让我滑落到地上就行。你们要埋的不过是我的身体,爱怎么埋就怎么埋吧!只要你们内心真正感觉到我还存在,没有离开你们,那么就用你们所想的方式埋葬我吧!”苏格拉底说完这话后微微一笑,环顾着身旁的人。

他接着又说:“各位!克里同不了解现在的我就是苏格拉底,反倒认为不久后看到的尸体才是我,所以才会问出要如何埋葬我的话。我服毒后,就必须告别你们到另一个国度去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谈了很久,这一方面是希望能使你们镇定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在安慰我自己。但是,我们的谈话似乎对克里同发生不了作用。我恳求你们去向克里同担保,向他保证,我死后不会留在这里,会到离这里很远的乐



园去。如此一来,他的心情必能平静;他看到我的肉体被焚化或埋葬时,哀恸或许可以减少,因为他不会再觉得那对我是一种虐待;同时,埋葬尸体时,他不至于说:‘埋葬的是苏格拉底。’克里同啊!你必须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根除,以免伤害了心灵。你应该鼓足勇气说:‘埋葬的只是苏格拉底的肉体。’至于如何埋葬,我想,按照一般风俗去做就行了。”

说到这里,他就起身洗浴去了。克里同陪同前往,却让我们原地等候。这时,我们彼此交谈,回味刚才他所说的话,然后又谈到我们将要受到的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因为当他归天之后,我们就会像是一群失去父亲的孤儿,只能无依无靠地度过惨淡的余生。当他浴毕回来,他的孩子们就被带进来了。总共三个,两个小男孩以及一个已经成年的孩子,此外还有他的几个女眷。他在另一间屋子和他(她)们谈话,说明了自己的遗愿。然后就让女人和孩子离开,又回到我们这边来了。

他在那间屋子里待了很长时间,所以回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他进屋以后就坐



下来,没有说几句话。顷刻间,狱卒走进来了,带着央求的口吻说道:“当我传令要死囚们举杯饮鸩的时候,他们就恨我,诅咒我。我相信您是不会像他们那样的。要知道,我必须执行上头的命令啊!这里关押过不少的人,可是我一直认为您是最文雅、最高尚、最优秀的一位。所以我敢断定,您不会迁怒于我,而只会怨恨那班真正负有责任的人。我此时此刻受命前来,要说什么,您心里一定明白。那悲惨的时刻就要到来,但愿尽量少受痛苦。别了,我的朋友!”他转过脸去,泪如泉涌,走出牢房。

“别了,我的朋友!”苏格拉底望着他的背影说道。然后回过头来对我们说,“真是个好人的哪!自从我入狱以后,他天天都来看望,有时候还跟我说上几句话,态度总是那么亲切。现在他在为我哭泣了。他是多么善良啊!你过来,我一定要照他的吩咐行事。要是那毒酒已经配了,叫人马上取来,否则就请他快点配好。”

克里同回答说:“可是,苏格拉底,现在太阳还没落山,时辰还没到哇!据我所知,别人即使接到就刑令以后,还要拖上很长一段时间。在



这段时间里,他们要痛吃酣饮,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还要会见他们想要会见的任何亲友。不要太性急吧,时间还早着呢!”

然而,苏格拉底却坚持说:“是的,克里同。你所说的那些人要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在他们看来。拖延时间好像就会得到某些东西。可是对我来说。这样做就等于犯罪,因为我并不认为迟一点服毒会得到什么好处。相反,那种吝惜生命,死抱住这个世界不肯撒手的行为,在我看来,是应当受到蔑视的。去拿来吧,请尊重我的请求!”

克里同只好向站在一边的小奴隶点头示意。那孩子转身出去,刹那间就把送药的人领进来了,他手里端着一杯配好的毒酒。苏格拉底看了看他说:“喂,我的朋友,你是精于此道的人,请告诉我应当怎么做吧!”

“很简单,”他回答说,“喝下去以后,就地走走,等两条腿感到沉重的时候,就躺下来,然后这药自会尽到它的责任的。”说完就将那可怕的死亡之杯递了过来。苏格拉底态度从容地接在手里,毫无惧色,然后就像一条公牛一样,用他





那暴突的眼睛望着这个站在面前的监刑官，“用这杯中的一点酒为神举行灌奠礼，可不可以？”“咳，苏格拉底啊。”他回答说，“这服剂量适中的药是专门为你配制的。”“我明白了。可是我想，为使我能从这个世界平静地到达那幸福的乐土，我应当向神祈祷，就让我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祈祷吧！”苏格拉底说过之后，用手蘸了一些酒，洒在地上，作为对神的献祭，然后，便沉着镇静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在此之前，我们大家还能勉强忍住眼泪。现在，目睹这般凄惨的场面，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泪流满面，只好拉起斗篷蒙住自己的脸。不是为他，而是为自己哭泣，为我失去这样一位诤友而悲伤。克里同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在啜泣了。阿波罗多一直在抽噎，现在更是放声大哭。除了苏格拉底之外，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心如刀绞，悲痛欲绝，仿佛世界到了末日。

“怎么可以这样呢，朋友们！”苏格拉底不高兴了。“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只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场面，我才让妇人们离开的吗？常言道，仁人志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务请诸位保持



镇静，坚强一点。”

经他这么一说，大家就收住眼泪，静下来了。他在屋里踱了一会儿，觉得两腿发麻，就按照那人的吩咐仰面躺下了。过了一会儿，那人走过来摸摸他，仔细察看他的腿和脚。然后用劲捶打，问他有什么感觉，回答说没有。不久，他又从腿部向上进行检查，到处敲敲打打，这是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的身体已经渐渐地发硬变凉了。他一边摸着他的身体，一边说：“等到毒性到了心脏，他就死了。”

狱吏在他那颇具特色的脸上蒙上一块布。凉气渐渐到达他的全身，他那带着某种命运感的死亡就要如期而至。这时他突然把自己脸上的布揭开，用微弱的声音对克里同说了人生中最后一句话：“克里同呀，我还欠了阿斯克列皮尔斯（古希腊的医学之神）一只雄鸡，切记要付钱给他，不要忘了！”（按古希腊习惯，一个人在被医生治好一场病之后，应当送医生一只公鸡作为答谢。苏格拉底大概是在受审前不久看过病，而不及送礼即行刑。）

克里同回答说：“好的，我一定照办！苏格



拉底,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苏格拉底已无法回答。过了一会儿,苏格拉底最后抽动了一下,便安然地死去了。那个狱吏马上将盖布掀开,人们发现苏格拉底的眼神虽已失去了光彩,却还是睁着的。

这就是苏格拉底临终时的情形,详情记载在柏拉图所著《对话录》中的《费多篇》。从这样一个场面,我们不难想象苏格拉底所具有的庄严和魅力,并显然具有某种圣人和殉道者的迹象。

苏格拉底以垂暮之年,被号称民主派者以似是而非的罪名处死,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但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如黑格尔所说也是“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



## 逃亡的道德

苏格拉底是克里同的老师，两人年龄相仿，又是好朋友。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克里同曾力劝苏格拉底逃亡，并且为他做了周详的谋划。

那天的黎明时分，在牢狱中等待行刑的苏格拉底被不知如何进来的克里同唤醒。克里同带来一个消息，虽然不是苏格拉底马上就要被处死，却也令人屏住了呼吸。

克里同对苏格拉底说：“前往提洛斯岛奉献祭品的船，今天就要回来了！”

原来，雅典人每年都有用船满载贡物，献给提洛斯岛上的阿波罗神的习俗。这种习俗起源于托尔休斯的誓言：许久以前，一条载着托尔休斯和少男少女的船，在前往提洛斯岛的途中遇难，他发誓道：“我们要是能被救起，我每年都会奉上祭品给阿波罗神。”后来，他们果真被救起，



这个允诺也就作为一种风俗如此沿袭下来。一直到苏格拉底的时代,雅典人仍慎重地遵循这个习俗以纪念这件事,因而在这艘祭品船从出港到归航的期间,一律不准执行死刑。

有时,这艘船也会因遇到暴风雨,延后返归。但是,克里同确实听说它今天从提洛斯岛回来。如果消息属实,苏格拉底只能再活一天,第二天就将被处刑了。

克里同对狱卒略施小惠,冒险踏入了苏格拉底房中,来告诉他船就要回来的消息,没想到苏格拉底无动于衷,一点也不觉意外。

他刚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位秀丽娴雅的女子对他说:“苏格拉底啊!你将在第三天,前往天堂般丰饶幸福的弗塔雅。”(弗塔雅一语,出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原意表示归故乡,此处意指人生归缩。)

克里同听完苏格拉底描述的梦境后,说道:“这个梦真奇特!可是,我最敬爱的苏格拉底啊,请你听我的话,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逃走吧!如果真的死了,我不但失去一位良友,更会蒙上不白之冤。不了解我和你的人,会以为我



将金钱看得比朋友重要，不愿意花钱救你出来。天下最可耻的事，莫过于重资财而轻朋友；世人必然不相信我曾经尽力劝你逃亡，而你却轻易地拒绝了我。”

苏格拉底听了克里同的话后说道：“亲爱的克里同，我们何必顾虑一般人的意见呢？只有贤者的意见值得我们尊重。”

“您说的不错，但是，大众的意见、社会的舆论，还是不能忽略的。如今您被判决的事，就是最好的例证，足可证明，任何被人诋毁的人，不仅会有小祸害，还会蒙受极大的冤屈。”

苏格拉底听了克里同的这一番话后，颇不以为然，他说：“克里同！我倒很愿意看到众人的力量能造成大恶，因为群众若能制造大祸害，就必然也有能力做大善事，这不是很好吗？可是事实不然，大众既不能使人成为贤者，也无力使人成为愚者，他们所做的是，全都是偶然造成的。”

克里同虽然没法反驳这个论点，但仍继续对苏格拉底说：“你不要担心我和其他的朋友，你若能逃走，其他的我都打点好了。虽然我们

会被告发,但顶多损失些钱财罢了。为了救你,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请接受我的哀求,逃走吧!”


苏格拉底确实考虑过逃跑后朋友的安危,但他想到的还不仅这些。他认为自己应该依公理、正义而行,不能被舆论左右。克里同仍然绞尽脑汁、费尽口舌想说服苏格拉底,他继续说道:“其实,你不必为我担心,那些狱卒所要求的费用并不高,告发你的人胃口也不大,不需花很多钱,就能满足他们。只要能救你出去,花多少钱都无所谓,我相信我有那份能力。如果你不希望我破财,常来看你的外国朋友,也很愿意解囊相助。塞凡的希米亚斯,已准备了一大笔钱,专为帮助你;另外柯美斯等人,也都已准备了一些钱。所以,请你不要为钱财的事操心。至于逃走后的去处,你更不要担心,到处都有朋友欢迎你,如果你有意到塞桑尼亚,那儿也有我认识的朋友,他们都很仰慕你、敬重你,你一定能在哪儿过得很愉快的!”

克里同思索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不认为你所做的事是正确的。你明明可以自救,为什



么不自救呢？你牺牲自己就等于落入控告你的人的圈套，为了毁灭你，他们千方百计地设下陷阱，你这样岂不成了帮凶吗？而且人们会认为你不顾自己的孩子，你应该可以养育他们，但你却决定舍弃他们，对他们未来的命运置之不顾，今后，他们就像孤儿一样。你应该知道，如果不打算抚育子女，就不应该生育，你如今的作为等于是舍难就易，不是勇者的做法！你曾公开说过，要奉献生命追求道德涵养的境界，所以，你更不应该如此做。”

苏格拉底静静地听着，没有答腔，克里同又口沫横飞地继续说道：“关于这件事的发展，我和你其他的朋友一样会被人批评胆小、无能。本来，人们告发你的这件事不循法律途径就可解决，但事情的演变却令人意想不到，你不但被带上法庭，甚至被判死刑。仔细思量这次事件的演变，真令人哭笑不得！世人一定会以为我们懈怠怯懦，我们本可以救你，你也可以自救，但却让机会一一错过。这对你或我们来说，都是不名誉又不幸的事。苏格拉底啊！请你好好想吧！”






克里同表情忧戚,显得非常无奈。忽然,他又若有所思地说:“其实现在根本没什么考虑的必要了,因为方法只有一个——今天夜里就必须采取行动,如果动作不够迅速,就会失败。苏格拉底啊!请照我的话做,不要再犹豫了!”

苏格拉底很感激克里同的热心,但仍未改变不愿逃亡的初衷。在苏格拉底的道德观念里,脱逃不是正当的行为,好友的劝告,使他的心情更沉重,因为,内心发出的声音告诉他逃亡不是正确的举动,而好友的美意又令他不忍拂逆。

任何一件事都必须用道德来衡量,力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打击,都不可改变信念,这是苏格拉底的信条。他不愿因脱逃而破坏了他一生所遵行的原则,他只能对克里同说:“在没有发现比现在更好的办法之前,我不能听你的话、照你的意思去做,请原谅我。”

苏格拉底甚至说:“即使众人使用比现在更残酷的手段,如禁锢、没收财产、杀戮等,我仍然不愿逃走。”



人类永远的师表,影响欧洲思想界几千年的苏格拉底,他似乎肩负有献身真理和正义的神圣使命,这使命禁止他接受逃亡之类流俗的意见,而勇敢地面对了死亡,他的死亡正是他生命最光荣的顶点。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烈士。

## 悲剧何以发生

苏格拉底之死是历史上的一桩公案。正如对苏格拉底的生平思想有各种看法一样,对他的死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这是一宗彻头彻尾的冤案,苏格拉底是阴谋的牺牲品;有的说,苏格拉底的罪状完全可以成立,纵然他的人格是伟大的;也有的说苏格拉底因从事反动活动而被处死实属罪有应得,有人甚至称他为“主张复辟倒退的反动派的祖师爷”,还没有什么人能够或者想要把这些说法调和起来。不过有一点人们似乎并不反对,正是由于他那带有哲学意味的死,他才成为历史上真正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死,是他生活的伟大一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死已构成苏格拉底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惟其如此,这一悲剧事件方有其讨论的价值。



在法庭上,原告控诉苏格拉底的罪名有两条:一是不信奉官方宗教而另立新神;一是他败坏青年。苏格拉底在申辩中完全否认他不信官方宗教的指控,但承认他确实相信有一种“灵异”。他说,从幼年起便有一种“声音”伴随着他,当他决定做什么事的时候,声音对不该做的事往往预加阻止,也仅乎他自己能够听得见;不过声音从不告诉他应该怎样做。我们没有理由说苏格拉底的“声音”是他凭空捏造的,有人解释说这可能是一种心理现象(如 A. E. 泰勒),或者是某种生理现象。类似的“怪事”在苏格拉底的身上时有出现,比如他有时伫立冥想达到“出神”的程度。当然,不能排斥苏格拉底思想中有宗教因素。他承认曾在曼提尼亚狄俄迪玛门下受过业,此人近似于女巫一流的人物。无疑地,苏格拉底也受了当时流行的奥尔菲斯教以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从苏格拉底许多言行来看,他是个敬神诚笃的人。因此,说苏格拉底不信传统的官方神祇,不见得是能够站得住的理由。至于说另立新神,只能认为是指的苏格拉底的“声音”,这一点恐怕更难以成立。所以麦



利都在法庭上根本就没有谈起这件事。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定个“无神论”的罪是相当重的。然而希腊人对于神一向有些浪漫主义(从《荷马史诗》以来),比如说在戏剧中对神发怨言,甚至公然拿宙斯大神开玩笑,也并不因此就犯下了什么渎神罪。公平地说,苏格拉底反驳这一条罪状,于情于理都是说得通的。

另一条是败坏青年的罪名。所谓败坏青年,就是控告苏格拉底把青年引上了邪路,说他“探究天上与地下事物,惯于颠倒黑白,并以此教人”。苏格拉底对这一点的答辩,表现得异常自信并且有些盛气凌人。他说他毕生以探求真理为职事,从不汲汲于货利,劝导青年惟善德是务,就如同父辈对于子弟那样,因此以邪恶教唆青年的罪名他实不敢当。苏格拉底诘问麦利都,既然说他把青年给带坏了,那么他愿意领教,善于教导青年的是什么人呢?麦利都回答,众人皆属青年的良师益友,惟有苏格拉底一人是毒害青年者。苏格拉底喟然叹曰,雅典人只有他一人是“害群之马”,他又何其不幸之甚耶!从问辩过程中苏格拉底已十分清楚,原告的意思



图并不在于和他说理,而在于给他定罪。他说:我苏格拉底果如原告所指控者对青年有所败坏,那也决非出于本意;无意本属过失而不构成犯罪,你麦利都应予以教育或劝戒,又何必定要绳之以法呢?麦利都则一口认定为故意。苏格拉底声称,他相信他往日的作为完全是正当的(按神意行事的);纵然这一次法庭将他开释,今后,他也决不会有一分偏离“追求真理”的轨道,这不折不扣是一项不肯“悔改”的声明。尤有甚者,在辩辞的末了,苏格拉底以教训的口气,对雅典的当政者做了辛辣的批评。他说雅典固不乏物质和精神文明,美中不足的是它贪求富贵而忽视善德,舍本而逐末。他将雅典城邦比做行动迟缓的大马,将自己比做马背上的“虻蝇”,宣称,非有虻蝇的刺蜇,则此钝马殆恐失其激励奋发之志。苏格拉底告诫说:虻蝇乃天赐与雅典者,今日杀我苏格拉底,雅典将不会再找到第二个虻蝇。这大概是历史上相当少有的一篇辩护辞。黑格尔认为,控告苏格拉底的两条罪状都是可以成立的。我们通过上述苏格拉底的有力申辩,则基本可以认定两条罪状均



似是而非。说苏格拉底不信传统官神,故意毒害青年,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已!

那么,苏格拉底之死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表面上看,苏格拉底被处死的原因有二:一是为证实神谕而得罪了一大批政界和文化界的名人,引起他们及其同情者的反感。的确,苏格拉底同这些享有智慧名声的人们交谈时,不断诘难对方,使他们出尽洋相,这自然会使他们怀恨在心。二是在法庭上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团。在法庭上,苏格拉底简直不像是个被告,因为他自始至终相信自己是无罪的。他不齿于向陪审团恭维或乞怜,自信正义在自己一边,不但不设法获得陪审团的同情,反而以不妥协和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陪审团。无疑,苏格拉底这种不屈不挠的一贯态度和对法官的蔑视激怒了雅典人,这是他被处死的重要原因。

据某些分析和记载,雅典当局本来无处死苏格拉底之意。如果他的自辩不是取此种态度,或者愿被放逐国外,或者愿纳较多罚款,很可能免于处死。这种说法未始不含有一些真



情。然而,苏格拉底对他自己的态度却不曾表露丝毫的遗憾。他执拗地说,神将为他考虑他死的最佳时刻。并声言,他年事已高,而且是本邦有名望的人,他不能为了苟延残喘,向那些主张处罚他的人折腰求情;恳求免于一死纵然不难,但要想免于恶名却是最难的事。苏格拉底在法庭上预言:凡是主张杀死我的人将无法洗雪他们的耻辱,今天他们为我定罪,判我死刑,而他们也必为真理所定罪,真理判他们为邪恶与不义。苏格拉底当即与众人做了诀别。

黑格尔曾言,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合法的(合于雅典的法律程序),我们同意这种观点。但问题在于合法不一定合理,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即属合理”的格言在这里也未必适用;相反,不合理的东西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往往比没有这件外衣可能还要坏些。这就是我们从“苏格拉底之死”这场悲剧中所体会到的。

事件的偶然性是永远也不能排除的。按雅典法律,判决死刑的人很快就得执行。但适逢雅典刚刚派出“圣船”去提洛斯岛,向阿波罗神献纳祭品。否则,柏拉图的《克里同篇》、《费多





篇》等恐怕就写不出来了。在这里值得特别提一笔的是苏格拉底的守法精神。克里同极力劝说苏格拉底趁“圣船”还没有返回,可以帮助他越狱逃走,而这样做事实上确也无大困难,苏格拉底对他这位好心的弟子说,此事他决不当为,他生平是个爱国者,岂有爱国而不爱国法的道理?况且他一生受法律的保护,断不能以老迈之躯破坏神圣之法律,果如此纵能苟活于世,必蒙终生之羞愧,憾莫大焉。苏格拉底将服从法律与服从执法者加以区别,他说,如果他死得冤枉(他是这样认为的),那是死于人而不是死于法,法是不可能不公正的;然而,他要是真的逃走,冀在对滥用法律的人“以恶报恶”,结果难免被人视为玷污法律的懦夫。此情此理,令人赞叹。黑格尔说苏格拉底不肯越狱,是因为他在狱中有些“承认自己有罪了”。其实不然,苏格拉底在狱中的所言所行,同他的人格和信仰应该说是浑然一体的。

现在该是提出另一个问题的时候了。难道雅典当局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两条罪状,真的就是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吗?研究家们普遍认



为,真正的原因当另有所在,一句话,即政治的原因。综合各家说法,主要的不外两条:一是苏格拉底的反民主派的政治态度;一是他的弟子(特别指亚西比德和克里底亚两人)的政治活动对他产生的有害影响。

首先,苏格拉底的政治观明显地是属于贵族政治的,尽管他的出身和家境与贵族无关。这种政治观与他的伦理观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他的伦理观的自然的引申。苏格拉底将政治亦视为一种“技艺”,因为它关系到城邦的善德,公民的福祉,所以它是各种技艺中最高的技艺。这样的技艺应该由什么人来执掌呢?按苏格拉底的想法,既然制鞋有制鞋的技艺,木匠有木匠的技艺,铁匠有铁匠的技艺,造船有造船的技艺,医师有医师的技艺,吹笛有吹笛的技艺,总之各行各业都有其专门的技艺,那么管理一个城邦、主持其政务的人们,又怎么可以没有专门的训练、专门的技艺呢?当一名合格的治国者,人们所要求于他的自然超过了任何其他技艺,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雅典的民主政体下,所有官职包括执政官、将军、500人议会议员、

陪审法庭陪审员,实际上都是抽签或投票选举出来的;而一切重大国事,包括战争和平、立法审判等,皆以简单的多数票来决定,这成何体统呢?苏格拉底认为,雅典民主政体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要求其领导者具有任何特殊的知识,它将社会的命运委之于缺乏真知灼见的人们的手中。苏格拉底认为,只有那种既有知识又有善德的少数人,才有资格管理邦国的事务;也只有他们,才能够教导广大公民成为“尽可能的善人”。苏格拉底对劳动群众显然是轻视的,主张贵族政治与轻视人民大众,本来也是互为表里的。不过,苏格拉底的贵族政治,与传统的贵族政治并不尽同。它所强调的不是门第,也不是财产,而是知识;这种政治观点固属保守(到了柏拉图更发展为“哲学王”的统治),但较之门阀和财阀的统治,似亦未可一概否定。“知识治国论”是苏格拉底政治观的基轴,也是他伦理观的实现,他的言论,不管他是否充分意识到,与现行民主政体的矛盾终属客观存在。“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离骚》),这或许就是苏格拉底悲剧的真正根源。有人说,



苏格拉底是一名“思想犯”，也就是他的思想主张(包括言论)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这样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其次，关于苏格拉底与弟子的关系，人们也谈得不少。有一种看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即认为苏格拉底广收贵族子弟，专门传授敌视民主制的观点，“他的哲学损害了青年人对本邦的民主制度，以及对雅典人民的政治、道德传统的信仰”(黑格尔语)。我们说，苏格拉底的弟子中实际上贫富贱贵皆有，他一向不收取学费，亦并非定要招收富家子弟；把苏格拉底说得似乎那个时候他的“阶级观点”就很强，未必符合历史事实。然而他的弟子中确实有产者居多数，这又如何解释呢？道理很简单，只有有钱的人才有更多的闲暇，“学而优则仕”，到头来自然还是这些人从政的机会比较多。至于说苏格拉底对其弟子的影响当然是有的，他对柏拉图的影响就很大；但是，能让苏格拉底对他每一个弟子的社会行为负责吗？比如亚西比德，此人与苏格拉底的关系较为密切。而且对老师钦佩得无以复加(见《宴话篇》)；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

因鼓吹远征西西里,并背叛祖国投降了斯巴达,给雅典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雅典人长久对他切齿痛恨。但正是这个亚西比德乃是伯里克利的外甥,自幼在伯里克利身旁直到成年以后,对此又该如何说明呢?再比如克里底亚,此人是“三十暴君”的首领,作恶多端,雅典人民对其极度厌恶,但他与苏格拉底的关系似乎并不怎么密切。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提到,当“三十暴君”统治时有一次命他与另外四个人前往萨拉米拘捕一无辜人士,他认为这是不正义的非法行为,甘愿冒险抗命,中途返回家中。苏格拉底说,如不是这股恶势力很快倾覆,他也早就身罹其害了。不管怎样,亚西比德与克里底亚给苏格拉底造成了麻烦总是真情。据说,苏格拉底死后不到10年,有个叫波里克拉特的人写过一本小册子,其中谈到亚西比德是苏格拉底教坏了的。另外,苏格拉底死后约半个世纪,有个叫埃斯启尼的人,曾说过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处死,是因为人们相信克里底亚是他教出来的。我们认为,雅典人对这两个坏人感到忿恨(这完全是正当的),因而迁怒于苏格拉底,在情理上是可以理



解的；然而，为此而使苏格拉底承担罪责，甚至夺去他的生命，就不能令人信服了（色诺芬的回忆录谈到这两个人，亦多为苏格拉底剖白）。

最后，人们想必会提出，既然政治原因是苏格拉底的真正死因，雅典当局为什么要闪烁回避呢？干脆以政治罪审判不是更便当吗？这是因为雅典作为战败国，对斯巴达不能不有所戒惧。斯巴达统治者不喜欢雅典内部继续闹党争，实际上是想束缚当权的民主派的手脚；聪明的雅典民主派来了个阳奉阴违，巧妙地窒息了苏格拉底的声音。

讨论至此，我们对雅典的民主政治（亦译平民政体或民主政体），特别是苏格拉底晚年所见的民主政治，有必要做一适当的评述。

从历史上看，雅典的民主政治乃是平民与贵族长期斗争的产物。自公元前6世纪初到5世纪中（伯里克利时），民主达到了鼎盛时代。一切公民皆有同等参加政权的机会，不受出身门第和财产资格的限制（10将军除外）；一切官职皆经由抽签或投票选举，担任职务时一般给以津贴。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



在雅典基本上实现了。民主体制(宪法)也相应地建立和完备起来。雅典宪法是以公民大会、500人议会及陪审法庭相互间某种平衡与制约为原则的,它们似具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雏形;但究其实质,与近代的三权制还是有明显差别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希腊亦包括雅典实行城邦制,小国寡民,不需要什么“代议制”;公民可直接选任官员,官员亦直接向公民负责。公民之与城邦,有如蜜蜂之与蜂房,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脱离城邦的人,如不是神便是野兽。所谓“希腊哲学家不知道不是城邦的国家”(E. 巴克尔),当然不是说希腊人不知道有埃及有波斯,而是形容希腊人太习惯于过城邦生活了。第二,立法、行政、司法虽各司其职,但它们之间的权力划分并不十分严格。比如,500人议会相当于当时的政府(无政府首脑),分组轮流执政,并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预审),其当值之主席团即为公民大会之主席,大会决议由当值主席联署公布。可见,立法、行政职能互有渗透。陪审法庭,按亚里士多德记载,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居于突出地位,其组



成和职能更能体现雅典的民主精神。雅典官职一般均一年选任一次,无门第与财产限制,所以除罪犯或精神病患者,公民有广泛的担当公职的机会。雅典人在 2000 多年前所创立的这一套政治制度,是整个奴隶社会中最先进的;这种制度对战胜波斯的侵略,对促进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艺术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关于这种制度的阶级局限性,人们已谈了许多,本书无须论列。以下只想就雅典民主制本身的发展,提出一点粗浅的认识。

像任何历史现象一样,雅典的民主制度也经历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当这种制度处于上升阶段时,它在调整自由民内部的矛盾,在促进社会安定和推动社会发展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雅典的民主制也包含了它本身的弱点,这种弱点在它那个时代是无法克服的,即它无法防止民主,以及它的孪生姐妹自由,走向极端化。从历史上看,民主和自由都是肯定的字眼,然而如果运用失当,它们也会转向自己的反面。其实,早在民主制的“黄金时代”,它即已露出了极端化的倾向。比如说,本来是为了预防





僭政的陶片放逐法,逐渐变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的雅典当政者好多遭受放逐(在当时这是一种重的处罚),不管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更不问其对邦国曾有何功劳(地米斯托克利即一例)。这当然不是正当的行使,而是滥用民主的权力。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为希腊世界带来了空前的震动和破坏),奴隶制开始显露了危机的征兆,雅典民主制的根基亦发生动摇。随着伯里克利之死,一颗象征政治“权威”之星陨落了。政治舞台终于成了野心家角逐的战场,内部倾轧愈演愈烈,有时陷于无政府的混乱,使邦国受到损害。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一批所谓“平民领袖”的出现。他们表面上高喊“平民至上”的口号,俨然是民主的旗手,其实好些人都是民主的蛀虫。苏格拉底批评过这种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批评得更厉害,将这班人视为极端民主的酵母菌,许多事情都坏在他们身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称平民领袖为“带毒刺的雄蜂”(第八章)。亚里士多德说:“‘平民领袖’把一切事情招揽到公民大会,于是用群众的决议

发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威。一旦群众代表了治权,他们就代表了群众的意志;群众既被他们所摆布,他们就站上了左右国政的地位。”这种极端民主实际上是集体的僭政,“平民群众的‘命令’有如僭主的‘诏敕’,平民领袖就等于、至少类似僭主的佞臣”。人们可能会说,这是亚里士多德对平民政体的成见。亚里士多德是有成见的,但不是针对一般的平民政体,而是针对强奸民意、破坏法治的极端平民政体;他本人应该说基本上属于温和的共和制拥护者。

为了说明极端民主给雅典带来的灾祸,不妨举出几例。公元前415年雅典冒险远征西西里,这是众所周知的。由于平民领袖亚西比德在公民大会上极尽煽惑之能事,雅典人冲昏了头脑,竟那般轻率地做了战略上的错误决定(稳健的尼西亚斯反对此举)。据说雅典人几乎每家都有征召入伍者,结果招致惨败,全军覆没。对雅典打击之重,对整个战局影响之大,修昔的底斯都做了充分而翔实的描写。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当远征军尚在途中,竟然命令其主帅亚西比德立刻回国受审,不管找出什么原因,这显然



是党派斗争置国家利益于不顾,野心政客利用平民情绪的又一事例。我们当然一点也不想为叛徒亚西比德开脱,而只是想指出,极端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公元前 406 年雅典人民在阿吉纽塞海战中打了一个胜仗,在境况不利时,这不失为一个难得的振作机会。不幸的是,据说因气候恶劣,指挥官未能收回阵亡将士的尸体(雅典人迷信尸体不葬则魂无归宿),本来应是凯旋有功的将军们,在政客的煽动下反而做了阶下囚。忘乎所以的民众,甚至违法把 8 名将军全部处死(包括伯里克利的儿子)。按雅典法律,在法庭上必须对被告一一表决。这一天一反常例,愤怒的人群与他们的首领公然违反法律,对 8 名受审的将军一道表决,不由分说立即执行。可巧,这一次正是苏格拉底当值主席(这是他最显耀的一次担任公职),惟独他一人对此种违法行为表示反对(也可算是“光荣孤立”吧);因为他仗义执言犯了众怒,在场的人呼喊将他捉起来(未捉)。这整个事件是置法律于不顾的、极端民主的一场可悲的表演。从历史上看,不论民主或自由都不宜走向极端,过分的



民主可能损害国家的法治,过分的自由可能破坏社会的稳定,而缺乏法治和稳定,则流于某种无政府主义亦在所难免。往常似乎有一种倾向,一讲到民主好像就是越激烈(实为极端)的越革命,一讲到激进民主派(实为极端民主派)好像就是当然的革命派,这种看法或类似的看法不可以重新加以考虑吗?不能否认,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比较冷静求实的学者,他是雅典政治生活的参加者和目击者,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地抨击平民领袖一流的人物,认为他们是破坏真正民主也破坏健全法治的始作俑者,人们总不能把这些话一言以蔽之曰“阶级偏见”吧!

应该说,雅典公民享有的自由确有其可贵之处,比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可以指名道姓攻击任何人,黑格尔曾说:这一种自由,如果不是有历史给我们保存下来的话,我们是不会想象到的。但是,且不问此种自由对奴隶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加入提洛同盟的外邦意味着什么,就是对“得天独厚”的雅典公民来说也存在一个实际的问题:这样的自由难道能够持久吗?历史告诉我们不能。人人都可以自行其所欲并不是



真正的自由,允许侵害别人的自由正是误解了自由的真义。公元前5世纪末期,雅典的自由一如它的民主,同样地趋于极端;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保守思想,那般的外露锋芒,终不能见容于雅典,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苏格拉底之死也无法掩饰一个事实,即雅典人对他们引以自豪的民主和自由,正在失却往日的信心。到公元前4世纪,这种民主和自由,随着奴隶制的城邦一道,无可挽回地经历了衰落的命运。

苏格拉底之死所以是悲剧,主要不在于他死于一些诬陷他的小人,而在于他死于同他一样热爱母邦的同胞之手。我们不可能设想,陪审法庭的大多数陪审法官都心怀叵测;可以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是正直善良的公民。他们之所以赞成处死苏格拉底,无疑是因为要保护雅典的纯洁,维护民主制的荣誉。而苏格拉底,这个至死不愿离开母邦的人,无疑也力图为母邦分忧,为母邦造福。共同的目的,不同的手段,致使双方剑拔弩张,性命交关,原因就在于对问题理解的层次不同。一般的雅典公民维护母邦,是维护她那外观宏伟的架子,而苏格拉底维



护母邦,是想加固那地下的根基;别人是用看得见的工具去维护母邦的建筑,苏格拉底则是用他所谓的心灵去维护母邦的根基。苏格拉底和一般公民的差距,就是苏格拉底悲剧的主要原因。

苏格拉底的悲剧性还在于,以他的学识,当然能知道自己拼上一死也难以唤醒沉溺于昔日美景、浑然不觉今日危机的雅典人。但他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他生平品格、情操的集中表现。对于苏格拉底这种义无反顾、为理想而献身的壮举,我们后人只能怀钦佩之情,而无非议之理。

## 苏格拉底的哲学伦理思想

苏格拉底乃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怪杰。我们不能用今人的思想去要求苏格拉底,也不能要求苏格拉底如今人那样地去思想。苏格拉底的时代是奴隶制的时代,但苏格拉底提出的一些哲学伦理问题,比如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何为善德、真理、正义等等,仍为今人所探讨;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进步,就会继续探讨下去。

### “知德合一说”

苏格拉底的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的事物,它们的生存和毁灭,都是神特意安排的。因此,研究自然就会冒犯神。既然自然界不能成为哲学的对象,他就集中精



力研究伦理道德问题。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美德，它和知识的关系如何，怎样才能获得知识？

在这些问题上，他的看法和智者学派是对立的。普罗泰哥拉是这个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曾提出一个著名口号——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说，人人都有自己的真理标准，没有普遍的客观真理。感觉是认识的惟一源泉，各个人的感觉和印象就是真理。我认为对的，对我来说就是真理，我想要做的，对我就是道德的。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怀疑一切，是这个学派的基本思想倾向。

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知识论上的。他认为，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认识普遍真理，培养道德引导人们去过道德的生活。正确的行为来自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来自知识，所以正义和美德就是知识，有知识就有幸福，没有知识就不能为善，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那么，这种知识和美德与智者学派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呢？他说：知识指的是认识公共福





利和普遍的道德规范。而不是指对个别、特殊和偶然事物的了解。例如仁慈、明智、谨慎、正直、勇敢、克制等等都是好的,但不是美德。美德是对所有这些品质的概括和抽象,因此不仅是个别人应当去追求的,也是大家应当追求并且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这就是说,知识涉及一般和典型,而不涉及特殊、个别和偶然。智者学派不了解这一点。可是苏格拉底在正确地肯定理性认识的同时,又否定感性认识的意义,认为应当依靠内心世界即“灵魂的眼睛”去了解事物,发现真理,而不能依靠人的感官,否则,他的“灵魂会完全变瞎了”。智者学派强调个别而忽视一般,强调感性认识而否定理性认识,从而走上怀疑主义道路;苏格拉底虽然高出他们一筹,但由于否认感性认识而走上另一极端。尽管如此,他把知识和道德结合起来,使二者融为一体,这种思想是颇有建设性的,是进步的。

但是他在前进的时候,又给自己设置了障碍。他认为,懂得什么是善的人是不会作恶的。这就是说,善是人人都希望的,只是因为愚昧无知,善恶不辨,有人才去干坏事。于是,他由此



得出结论说：世上没有故意作恶的人。这是一个抹杀阶级存在的错误结论。在他所生活的那种社会里，愚昧无知固然是罪恶的因素，但不是罪恶的根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阶级压迫才是产生罪恶的渊藪。这一点，苏格拉底当然不可能知道。可是他应当知道，克里底亚是有知识的，懂得什么是善，干的坏事却比别人都多，危害比别人都大。可见，这个结论属于主观想象，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亚里士多德对此就不以为然，说他忽视了“灵魂的不合理部分”即感情的作用。这是中肯的批评。

### “能者治国论”

美德即知识，有知识的人才能为善。苏格拉底以这种思想为核心，构成了自己的“能者治国论”。他认为，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政权应由经过训练，有知识有才干的人来管理，反对以抽签选举法实行民主。他说：领港员、建筑工、吹笛手和其他能工巧匠都是学出来的，不是用抽签法选出来的。退一步说，即使这些人也要用抽签法来选举，那么，这种做法所造成的弊害也远



比用抽签法选举领导人所造成的危害要小得多。他公开这样说,而且不时和别人争辩,于是就被视为一个仇恨民主政体的危险分子。其实,反对抽签选举法只能说明他想刷新政治,不能说明他想推翻现行政体;再说,他有自己的想法,并以一定事实为根据,不能认为毫无道理。他认为:

第一,好的统治者或管理者不是掌握权柄、仗势欺人的人,不是那些由群众选举的人,而是那些懂得怎样实行管理的人。一条船,应该交给熟悉航海的人去管理。船主和船上其他的人都服从他;土地所有者懂得农业,运动员知道怎样锻炼;纺羊毛时,妇女应当管理男子,因为她们精于此道,而男子却不会。

第二,军队缺乏纪律和服从,经常干出不正当的事,这是由于军官的无能。我们的将军大多是临时选出来的,缺乏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才能,所以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如果觉得自己无知,就应该向有识之士求教,可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

第三,不经过调查研究而侥幸成事,叫做运



气好；经过学习和练习而成就某事，谓之行为好。那些最优秀并且蒙神宠爱的人，是能够胜任自己工作的人。例如，精通政治，就是一个优秀政治家。受人敬重的名人总是出自最有知识的人之中，那些无耻之徒总是来自最无知识的人之中。一个人要想获得名声、受人尊重，就必须充分掌握有关你要做的那件事的知识。

第四，女人持家，男人治国，若没有节制和正义，能管理好吗？所以不论男女老少，只要有节制和正义，就是好的男人、女人、老人和青年了。

这些想法能不能说他反对民主政治呢？显然不能。相反，倒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爱国者，主张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国家都应该让那些有知识和懂得业务的人来管理。甚至妇女可以管理男子！这么一来，就可以补偏救弊，使国家制度得到改善。那么，雅典民主制度的弊病是什么？我们举马拉松战役的例子来说明。公元前490年，波斯大将达提斯率领几十万人在马拉松登陆，雅典告急。按照惯例，十个将军要轮流担任指挥，每人一天，这种做法确实民主，但是每天



换一次司令官,仗究竟怎样打法!幸好亚里斯提德尚能顾全大局,他以缺乏将才为理由,把指挥权让给了别人,其余的将军以他为榜样,也照此办理,才使指挥权得以掌握在熟谙韬略的米太雅德手里,终于以少胜多,化险为夷,取得胜利。此事说明,极端的民主是要不得的,要想保卫祖国,克敌制胜,固然需要依靠人民的支持和士兵的勇敢,但没有精通战术和兵法的军事专家也是不行的。由此可见,早在苏格拉底出生以前20年,现实生活就已经把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了。他所说的能者并不限于少数特权阶级,而是包括各行各业的人。他的“能者治国论”并没有多少贵族气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要求。苏格拉底的这种观点由其弟子柏拉图做了进一步发挥,也多少影响到亚里士多德,他们师徒三代对雅典平民政体,特别是“平民领袖”在极端民主中所起的消极作用,予以猛烈的批评。这些批评虽不免含有某种偏见,但也的确反映了一部分事实。即使以今人观点来看,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 “苏格拉底方法”

上面说到,苏格拉底主张把美德和知识联系在一起。那么知识(智慧)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可教的还是不可教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国有这种看法,雅典人一般也是这么看的。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和美德是可以通过受教育而得到的,惟一的困难是缺少既懂得美德的概念又能施教于别人的人。他虽然认为自己没有智慧,不足以施教于他人,却甘愿尽一个社会道德教师应尽的义务,时常和青年保持接触,通过谈话使他们受到教育。

苏格拉底使用的方法是辩证法,本来的意思是谈话或讨论。讨论时应遵守一定的规则:回答问题的人必须简洁干脆,回答所问,不能提出别的问题,不许反对对方的问法;二人可以互相轮换,起先甲问乙答,然后乙问甲答,但须经双方同意。

第一个使用这种方法的希腊人可能是芝诺。苏格拉底受过他的影响,同时又发展了辩证法,使它成为一门帮助对方纠正错误观念并



产生新思想的艺术。智者认为,人们的观点相互对立,不分好坏,没有一般真理。苏格拉底说这是错误的。思想有差异,这是事实,但是应该异中求同,找出为大家所能遵守的共同原则。他的方法就是要从个别抽象出普遍的东西,包括讥讽、助产术、归纳和定义四个步骤。“讥讽”就是通过不断提问,使对方自相矛盾,承认对此问题一无所知。“助产术”就是帮助对方抛弃谬见,使他找到正确、普遍的东西,即帮助真理出世。他曾经对他的朋友说:我母亲是接生的,我向她学到了接生术,不同的是,母亲是肉身的接生者,我是“智慧的接生者”。“归纳”就是从个别事物中找出共性,通过对个别善行的分析比较来寻找一般美德。这是一种阐明伦理概念的方法。“定义”就是把单一的概念归纳到“一般的东西”中去。色诺芬讲过一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苏格拉底的方法。一天,苏格拉底和一个名叫攸昔德谟斯的青年讨论正义与非正义问题。他在一根柱子上写上“正义”,在另一根写上“非正义”,然后问道:

说谎应当归入哪一类?



攸：归入非正义，这是显而易见的。

苏：欺诈呢？

攸：当然也属非正义。

苏：偷盗呢？

攸：和欺诈一样。

苏：卖人为奴呢？

攸：也是如此。

苏：看来这些行为没有一样能归入“正义”一类了，是不是，攸昔德谟斯？

攸：是的，谁也不会荒唐到那个地步。

苏：那么，如果一个被选为将军的人，带领部队去奴役一个同我们敌对的城市，我们也说他的行为不公正吗？

攸：绝对不能这么说。

苏：我们将会说他的行为是公正的，对不对？

攸：一点不错！

苏：假如他在作战时欺骗了敌人呢？

攸：那也是正义行为。

苏：如果他盗取或抢劫敌人的财物，他的行为不也是正义的吗？





攸：一点也不错。可是我原先以为你问的那些只是对朋友而言的。

苏：那么，刚才我们归入非正义的那些行为，同样也可以算做正义，对不对？

攸：对的。

苏：那么，我想改动一下刚才的分类。就是说，欺骗敌人是正义行为，但这样对待朋友就不是正义的了，可以这样说吗？

攸：当然可以。

苏：那么，在失利的时候，一位将军发觉士气低落，谎称援军就要来到。结果，士气竟被他鼓动起来，我们应当把这种欺骗士兵的行为归入哪一类呢？

攸：应当归入正义一类。

苏：一个小孩生病不肯吃药。父亲说，这是好吃的东西，不是药，骗他吃了下去，病也好了。这种欺骗儿子的行为应当归入哪一类呢？

攸：我想这也是正义行为。

苏：某人因为绝望而想自杀。他的朋友出于友谊而偷走了他的剑。这种行为应该归入哪一类呢？



攸：当然也应当归入正义一类。

苏：可是你刚才不是还说应该永远对朋友坦率无欺吗？

攸：实在是我错了。如您允许的话，我愿意把原先说过的话收回。

苏格拉底的方法是用问答求知识的方法。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话把对方已有的知识引导出来。其最大特点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由于缺乏分析的态度，人们往往陷入思想混乱，不能从已知的东西得出正确的结论。攸昔德谟斯就是这样。可是通过对话，他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正义与非正义是具体的，但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可见这种辩证法在培养分析能力、推理能力、概括能力和达到逻辑的一贯性方面是有用的；对启迪人们的心智，树立理性的权威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轻易抹杀的。但是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它只适用于某些人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例如伦理道德问题），而不适用于其他未知的东西。

## 苏格拉底的历史地位

### 伟大的爱国者

生命是短暂的,也是永恒的。一个人,如果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提出和解决一些时代急需解决的课题,为历史增添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即使肉体消失了,却是虽死犹生,精神长存。

在家庭生活方面,苏格拉底精神表现为平等地对待妻子。伯里克利时代号称黄金时代,但是对于多数雅典妇女来说,却仍然是黑暗时代。她们受着男子的严格约束,不能随便出门,不能参加公民大会,无权担任社会公职,如同家庭奴隶。苏格拉底对待珊蒂柏的态度,不但使我们看到一种惊人的克制能力,也使我们看到了一种试图改善妇女地位,革新家庭关系的意向。妇女也是人,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他说:



“没有和谐一致，一个家庭不会成为幸福家庭。”这样的家庭观，在古代是崭新的，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可取的。

在社会生活方面，苏格拉底精神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

古希腊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在一个中央政府管辖之下。每个城市公社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只受它自己法律的支配。由于小国寡民，全体公民就可以齐集在一处，直接制定法律，办理公务，所以没有推选代表的必要，这和今天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政治是不同的。从法律上说，只要是雅典公民，他就是行政家和立法家。在这种情况下，派别之争随时发生，派别之见达到极点。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派别的利益，没有国家的利益。结果，连派别利益也不见了，只剩下个人利益，以致贪婪、野心、营私舞弊、无限制地追求财富、极端的惟我主义成了当时政治生活的显著特征。一个人，只要受过一点教育，能说会道，能操纵群众的感情，就有希望担任国家官职。

由于实行民主政治，法律掌握在公民手中。

雅典的陪审法庭由人数众多的公民组成,可以说是这个小民族值得引以自豪的一项创造。但在实际上,案件的审理仍然操纵在个别活跃分子手中。

苏格拉底虽然生活在这种社会里,却不像一般人那样浑浑噩噩、醉生梦死地了结一生。他为人正直、遵守法律、热爱他的祖国。

当然,他所爱的那个国家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且,当雅典干涉、欺侮和压迫别国的时候,他也积极支持,这说明他的爱国主义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尽管如此,在古代欧洲奴隶制社会里,他的行为却代表着一个道德发展的新水平。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的祖国不爱他,他爱祖国;他的祖国对他不义,他对祖国有情。这种生活哲学与狭隘自私的利己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大部分雅典人所不可理解的。他们虽然比苏格拉底活得保险一些,却没有给历史增添多少光彩。

### 勇敢的改革家

作为思想家,他的学说包含杂质,不能完全



令人信服。例如,他强调知识,却把自然界排除在人的认识范围之外;他重视智慧的培养又认为人不如神;他重视理性知识,却忽视感性知识,并且从性善说出发,武断地认为世界上“没有故意作恶的人”。这种道德说教,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是超越人们的经验的。虽然存在这样一些缺陷,但他的知识论(“知德合一”)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他提倡学习知识,认为虔诚、公正、勇敢、自我克制是美德的四种主要形式。他自己这样地实践着,也希望别人能够如此行事,于是就表现出一种企图用社会美德去代替片面的宗教美德的意向,一种意味着在思想领域除旧布新,实行变革的意向。

“能者治国论”是他的知识论的政治表现形式。他对派别斗争感到厌烦,对抽签选举不以为然,希望出现一个安定的环境,团结的局面,为此,他竭力主张选贤任能,让有德性、有才干的人参与国家管理,因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强盛起来。

在政治生活中,苏格拉底精神表现为舍旧图新,锐意改革。他既想在思想领域实行变革,

又想在政治上对社会进行改革；既反对贵族派的血腥统治，又反对民主派的极端措施。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一定会同他的公社及其保守的宗教传统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虽属新与旧、进步与保守之争，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苏格拉底被碰碎了。

当时的雅典人，大部分认为苏格拉底有罪该杀。这些人不一定是民主派，也包括克里底亚之流在内。我们今天研究苏格拉底，就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的态度。民主政治的胜利，使得公民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这会促进争辩、思考和推理的发展，有利于理智的开发，从而必然会导致少数先进分子向旧的传统提出挑战。苏格拉底就是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斗士。没有民主政治就不会有苏格拉底。另一方面，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还有一块保守的宗教禁区。这是谁也碰不得的。在这块散发着腐臭气味的圣地上，一切自由、民主统治是不能容许的。所以，与其说苏格拉底是民主政治的敌人，不如说他是民主政治的产儿。苏格拉底之生，是民主政治的色彩；苏格拉底之死，标志着



民主政治已经衰落。

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和辩证法使他在西方哲学史上获得重要地位。哲学史家甚至以他为界在欧洲哲学史中划出了一个“前苏格拉底时期”。

苏格拉底是一位著名哲学家。这是哲学的评价。从历史角度看,他不愧为古希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勇敢的社会改革家。他的设想虽然未必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面貌,但是他那朴素的专家治国论却和他那种坚忍不拔孜孜以求的精神一样,在古代奴隶制的丧钟声中,又随着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延续发展了。



## 结 语

全人类公认的圣哲苏格拉底死了，他所给人们树立的典范和留下的传说，也在他喝下毒酒走向死亡的那一时刻降生了。他的名字，萦怀在他的朋友弟子和亲友的心中，也萦怀在后来人以至我们的心中，使人们几千年来不断地谈论他，以他的精神去生活去进行哲学的思考。

虽然苏格拉底的形象在人类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面貌各异，如初期教父把他看做一位基督宗教殉道烈士的先驱；启蒙时代的学者把他视为一位独立的思想家；而尼采则苛责他为希腊悲剧精神的死对头……

但是无论我们从什么途径获得苏格拉底的某种形象，总觉得他在冲击着我们的心灵，这不是所谓的诗意和幻想可以办得到的。苏格拉底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宁死坚持其所信，他完全




可以称得上是哲学日历上的殉道者！2000 多年过去了，但是，圣哲苏格拉底，仍然咄咄逼人地站在我们面前！

## 编 后 记

人类创造了历史,人类创造了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他们在政治、军事、科技、思想、文化艺术诸领域的卓越成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世界文明的进程。这些时代的巨人,就像不灭的星辰,在人类历史的浩瀚星空中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人类文明的成果是没有国界的。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青少年一代的头脑,才能使跨世纪的一代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实现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梦想。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用三年的时间,集结全国知名的学者,组织编辑了这套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百人百册)。这套丛书收录了上至古希腊、罗马时代,下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00位著名人物,每个人物单独成册,每册六万字左右,以青少年最喜爱的传记形式介绍其在历史上的杰出贡献,思想的积淀和生活、情感的轨迹,使广大青少年能够在思想道德、意志品格等方面受到启迪,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以奋发向上、博采众长的崭新时代精神,去再创中华民族的辉煌。

为这套大型世界历史名人传记丛书撰稿的作者,多数是对传主潜心研究,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他们治学态度严谨,对所写人物力求以史实的准确性为第一要义,这些作者多是思想活跃、成果累累的学人,他们在撰稿过程中吸收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出信史精神。文字尽量浅显生动,可读性强,所以这套丛书又可以看做是大手笔写就的“小”文章。

我们希望青少年读者能够喜爱这套读物并使之成为永久的珍藏。

《世界历史名人》编辑委员会

1999年11月